

協商「發展律令」： 早期童年的育兒實作與親職治理

曾凡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本研究關注當代「科學育兒」的親職建構與家長經驗，聚焦在早期童年被定義為發展關鍵期的專家論述，以探究母親們如何應對其中蘊含的育兒要求，並強調論述異質性以及孩子行動能力對於日常照護實作的影響。首先，本研究將這種新興的專家論述命名為「發展律令」，再區分四種主要類型：情感依附、社會適應、大腦開發、正常性，分別訴諸特定的科學權威，建構不同的兒童特質與問題化，也配置各自的育兒技術與母職角色，並透過多樣管道進入私己的家庭生活。發展律令的規範力量植基於社會上既存的家庭觀念與母職意識形態，唯新的論述以科學之名擴充母親們的職責範圍，並設定緊迫時間性來強化育兒投入。而母親們對發展律令的接納與實踐程度，則是與她們原本具備的親職價值及資源條件持續協商的結果。同樣重要的是：嬰幼兒本身亦是影響母親選擇、調整與反思專家建議及權威的重要行動者。即便表面上看似母親們基於不同利益與興趣而自我治理，育兒現實必然是在論述與照護實作的動態來回中，隨著嬰幼兒的發展進度，乃至於孩子的回應與意願而共同構成。

關鍵字：科學育兒、早期童年發展、專家論述、母職實作、親職治理

台灣社會學第 37 期（2019 年 6 月），頁 47-97。DOI: 10.6676/TS.201906_(37).03

收稿：2018 年 10 月 15 日；接受：2019 年 6 月 14 日。

* 通訊地址：11529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Email: ftseng@sinica.edu.tw

Negotiating “Developmental Imperatives”: Childrearing Practices and Parental Governance in Early Childhood

Fan-tzu Tse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parenthood and mothers' experiences in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childrearing” and focuses on contemporary parenting advice for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qualitative interview data from 41 mothers and related postings by mothers on two online parenting forums. These new parenting discourses are conceptualized as “developmental imperatives” and categorized into four themes: emotional attachment, social adaptation, intellectual potential, and normality. Each theme incorporates specific scientific theories, childhood perspectives, problematics, childrearing techniques, and aspects of the mother's role. The dominance of these developmental imperatives is enhanced by extant ideologies of motherhood, while the new parenting discourses have expanded the range of mothers'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child and resorted to concepts of “crucial periods” to ensure mothers' engagement. This study finds mothers' preference for the specific developmental imperative depending on its assumption about childhood and developmental goods, but mothers' daily practices have been compromised by their resources. In addition, young children's own temperaments and abilities also strongly influence mothers' choice, adaptation, and reflection on expert advice and authority. Since the child is an actor in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no developmental goals and mothering practices can be actualized without his or her willingness and collaboration.

Keywords: scientific childrearing,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expert advices, mothering practices, parental governance

一、前言

許多關注親職文化的研究者都同意：當代社會的親職角色已開展出新的樣貌，尤其彰顯在各種專家建議的急劇擴張，課責家長負起比他們父母世代更多樣的照顧與教養責任（Lee et al. 2010）。這樣的現象，無疑承襲並加劇了兩個既存的趨勢與意識形態：一是十九世紀以來的「科學育兒」（scientific childrearing）（Apple 1995），認定母親不能只依靠自身的經驗與直覺，而必須學習最新的科學與醫學知識，才能適當地養育孩子；另一則是直接受其影響的「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Hays 1996），同樣是將期待加諸母親身上，主張她們除了遵循專家指導，還應該以孩子為中心，投入高度的情感、金錢與勞動力，以執行育兒任務。

在這種科學醫學專家系統持續形塑並強化育兒任務的趨向下，本研究著眼於其中相關專業建議的轉變——從過去聚焦在孩童生理健康的醫療衛生主義，朝向課責家長滿足子女的心理需求（Urwin 1985; Urwin and Sharland 1992），以及特別是從嬰兒時期開始，就必須提供豐富的教育與認知刺激（Quirke 2006; Wrigley 1989）——據以探問支配性論述與日常實作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以「發展律令」（developmental imperatives）來指稱這些新的教養規範，意即家長有責任在孩子的嬰幼兒階段強化其身心發展，以提升他們未來的福祉。

這種幾近「嬰兒時期決定論」（infant determinism）（Kagan 1998）的主張，儘管有其長遠的文化根源，但仍有別於傳統例如「三歲定終身」的論點：一方面，當代對於早期童年的重視，與二十世紀以來兒童發展科學的研究成果密不可分（Bruer 1999）；另一方面，「教養」（parenting）也相應地形成一門可概化且日益精細的知識與技術，家長的行為——取代孩子本身——成為專家論述甚至政府治理

的焦點 (Lee et al. 2014)。¹ 此外，發展律令也不同于其他著重孩子有個體差異的發展觀點 (例如「大雞晚啼」)，或主張家長應順應孩子內在規律的「適性發展」、「自然成長」等教養取向，而是以在嬰幼兒階段強化孩子特定的發展面向 (例如認知、情感與社會性、語言或是動作)，以確保至少能達到發展常規 (developmental norm)、甚至建立某些優勢能力為目的。²

本研究想探問的正是這樣的發展律令如何作為一種支配論述，形塑當代母親們的育兒經驗。既有關注科學母職的文獻，傾向聚焦於中產階級母親以及單一育兒面向 (例如母乳哺育、依附關係建立，或促進認知發展)，分析她們如何接納科學權威，成就新自由主義的自我治理 (例如：Faircloth 2010b; Murphy 2000; Thornton 2011; Wall 2004)，或是聚焦在光譜另一端，檢視特定身分的母親們如何因階級、少數族裔或其他因素而被建構為風險群體 (at-risk groups)，經歷更強化的、政府直接介入的親職教育 (例如：King 2018; Reich 2014; Romagnoli and Wall 2012; Valencia 2015)。

然而，其他研究也已經指出，教養場域其實同時存在異質論述與多種群體，彼此競逐不同的親職理念與實作 (參見：Lan 2018; 藍佩嘉 2014)。早期童年的發展促進亦然，複數的發展律令使得母親們經常莫衷一是，必須在各家之言中做取捨。例如在新生兒階段是該以孩子為中心，盡量滿足寶寶的安全感？還是訓練嬰兒發展自我安撫的能力，才不會養出依賴性？又像是學齡前大腦據說有無限發展潛力，該怎麼安排早期教育，才能最好地掌握這段「黃金期」？而與這些育兒要求同樣重要、卻時常為人所忽略的是：促進發展的育兒實作並非總是朝向追求秀異。隨著身心障礙早期介入療育 (early intervention)

1 這裡有必要指出：雖然相關育兒建議經常以指涉雙親的「家長」為課責對象，但現實的家務分工卻往往是母親承擔起這些不斷增生的育兒責任。

2 相對上，「適性發展」、「自然成長」等教養取向雖然也需要家長費心經營規畫，但核心價值仍在於讓孩子擁有「純真童年」 (Lan 2018; 藍佩嘉 2014)，而非發展某些能力或強化特定表現。此外，發展律令也特指在嬰幼兒時期，依據發展有階段性進程的觀點來配置相關的親職投入，因而有別於其他較整體性的兒童教養論述。

的實作愈來愈受到制度性重視，那些被認為有異常風險的嬰幼兒，他們的發展進度更被錙銖必較，家長也愈發被體制課責要與專家共同合作，以確保孩子的正常性。易言之，要全面性地理解當代的早期育兒經驗如何為嬰幼兒發展的科學醫學論述所重塑，不能只看到那些孩子健康無虞的家庭。³ 唯有同時照見孩子「被預設為正常」以及「被判斷有風險」的家庭，才能梳理發展律令如何透過不同的治理形式，從相對彈性到強制、從遠端專家到直接介入，再再強化異質的家長群體對於早期童年發展的投入。

因此，本研究所稱的「發展律令」並非單一的教養主張，而是鬆散連結了幾套側重不同關切的論述，各自訴諸特定的科學理論、育兒技術與母職角色，並且透過不同（但可能重疊的）管道進入私己的家庭生活。相似之處在於，它們都強調嬰幼兒時期教養的高度重要性，並經常訴諸看似有科學證據的「關鍵期」（critical period）概念，以「錯過就不再」（now or never）之類的修辭，來合理化對家長在孩子特定發展階段的育兒要求（或必要時接受專業介入）（Broer and Pickersgill 2015）。本研究將首先梳理對當代台灣家長育兒實作較具影響力的幾種發展律令，檢視母親們如何從這些異質建議中，建構自己的育兒經驗，同時協商專業論述所預設的孩童想像與母職規範。而當多數發展律令都許諾孩子有所差異卻盡皆光明的人生願景，讓家長能依其所欲而（被）治理（de Beistegui 2018），故事的另一面是國家持續考核每個孩子是否符合標準化的發展進度，並透過早期介入的專家系統，強加正常性計畫（normalcy project）（Frederick 2017）給孩子被辨識為有遲緩風險或身心障礙疑慮的家庭。在這種情況下，家長們如何應對專業權力，協商對孩子正常性的認識與育兒要求，亦是理解發展律令如何形塑親職不可或缺的重要面向。

3 這樣的觀點受惠於女性主義母職研究的洞見，指出父權社會對於母職意識形態的建構，其實是將立基在對白人中產母親搭配身體健全（able-bodied）孩子的觀察，予以自然化並普遍化（O'Reilly 2010: 970）。

二、發展科學、育兒建議與親職治理

本研究將發展律令的興起，定位為科學育兒的新扉頁。從十九世紀以降，科學與醫學的育兒論述歷經幾番更迭，反映出西歐與北美社會在不同時代對於「童年」、「家庭」與「親職」賦予的不同意義，也與特定治理模式及技術相互連結（Nadesan 2010）。而台灣當代的教養實作，隨著九〇年代後台美之間的文化流動管道，高度受到美式育兒論述所影響（Lan 2018），因此有必要先略述美國的發展脈絡，以呈現相關知識領域的推展及其所衍生教養建議的改變。這樣的回顧必然有過度簡化的危險，但本研究目的不在分析這些論述的發展，而只是做為討論台灣相關發展律令的知識基礎，是以也未處理論述如何跨國移動與轉變。

關於兒童的科學研究萌生自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以回應當時社會經歷快速變遷而引發的動盪與重組之後，人們對於兒童照顧與訓練日益高漲的興趣（Siege and White 1982）。藉由主張兒童發展的科學規律及其影響因素，心理學知識首先取得主導權，重新建構孩童養育與親子互動的理想方式，不但改寫了親職的意義，也催生出特定的「正常兒童」（normal child）概念與合格教養（competent parenting）定義（Ward 2002）。而在心理科學專業內部，初登場的是 1920 年代的行為主義取向，預設孩子宛如一張白紙等待後天模塑，建議母親透過明確回饋來培養正面習慣，並避免過度保護有損孩子的人格完整。這樣的學說反映出當時美國的家庭規模縮減，連帶強化了母子關係，使得心理學家擔心容易造成母愛泛濫跟過度溺愛，因此鼓勵母親維持與孩子一定程度的情感疏離，才能在家庭的「實驗室」中扮演「技師」角色，以塑造孩子成為具有正確道德觀念與良好行為的公民（Grant 1998）。

二戰後伴隨著戰後嬰兒潮，社會期待女性回歸家庭擔任全職主婦，育兒論述相應地轉向關照孩子的內在世界，強調「寶寶自己最

懂」(baby knows best)，母親該做的只是跟隨孩子引導，回應充分關愛與提供支持性的照顧，以確保孩子的心理與情感福祉 (Grant 1998; Strathman 1984)。這種新的育兒觀念受到當時精神分析傳統所提出「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的強化 (Bowlby 1969)，⁴並在 1970 年代後進一步擴展，使得母親的敏感度 (sensitivity) 與回應性 (responsiveness) 成為新的母職標準 (Thornton 2011)。儘管對孩子特質與相關養育責任的看法與行為主義取向有所紛歧，卻都是立基在視孩子為發展中個體 (the developing child) 的心理學認識，並隨著 1960 年代「發展關鍵期」的概念逐漸普及 (Bloom 1964)，持續強化各種心理專業 (psy expertise) 對於親職的建構，培養心理健康並富有生產力的公民成為新的治理目的 (Rose 1990)。

1990 年代再度出現育兒典範轉移。神經科學對於大腦的影像研究，透過大眾媒體的轉譯與傳播，開啟了充滿熱切希望的「認知時代」(The Cognitive Age)。嬰幼兒發展中的大腦，取代既往對人格或心理的直接關切，一躍成為世紀之交育兒論述的核心 (Nadesan 2010)。結合過去已經浮現的關鍵期概念，新的「神經教養」(neuparenting) (Macvarish 2016) 主張早期階段的大腦具有無限但未決定的潛能，父母若能提供「豐富環境」(enriched environment) 的刺激，就能快速增進孩子大腦神經突觸的密度，從而開發大腦功能。即便這類宣稱的科學性常被質疑 (例如：Bruer 1999)，它們仍強化了既存的親職決定論：家長被認為只要做「對」每一個育兒決策與實作，就能保證並極大化孩子當下與未來的健康與成就，反之則會讓孩子蒙受生理、心理與社會不利的後果 (Furedi 2008; Wall 2004)。是以日常育兒的瑣碎實踐，例如餵食或是陪玩，都被重新包裝為「機會之窗」(windows of opportunities)，期許母親們扮演盡職的教育者，為孩子潛力無限的大腦提供充分的發展刺激

4 John Bowlby 的依附理論雖是立基在觀察英國戰後失親的機構化兒童，這樣的觀點卻逐漸延伸到對於一般兒童的照顧建議，包括即時回應孩子需求、長時間的身體接觸 (盡可能揹或抱著寶寶) 等等，來確保孩子與母親形成穩固的依附關係。

(Budds et al. 2017)。

而正如其他研究者亦已注意到，這些號稱基於神經科學研究而衍生的育兒建議，經常採取優化 (optimizing) 或警告 (warning) 的形式，除了結盟商業市場來徵召個別家長在私領域的投入，也藉由表達對於社會秩序或國家前景的焦慮，訴求對於早期童年更廣泛的政策介入 (Macvarish 2014)。雖然遠早於神經科學當道的時代，許多歐美國家就開始為發展風險的嬰幼兒提供療育服務，但自 1990 年代以來的明顯轉變是：兒童福利組織與政治工作者積極訴諸神經科學權威，說服政府應更加積極保護或強化孩子大腦發展的情感與認知面向，以「預防」日後的不平等、貧窮、低教育成就、暴力與心理疾患問題 (Hulbert 2004; Lowe et al. 2015; Thornton 2011)。與此同時，對介入的強調也伴隨「風險中兒童」(children at risk) 概念的擴張，正當化國家與專業對家庭生活與孩子發展進度的監管與查核 (Lowe et al. 2015)。

相較於前面討論追溯西方育兒知識發展的轉折，這階段對於嬰幼兒發展與相關風險的新關切，則是早期介入作為身心障礙權利與國家治理的政策倡議，與神經科學結盟的結果。在這樣的政策脈絡下，「發展遲緩」(developmental delay) 成為新的童年障礙類別，且一併裝配了相應的親職腳本 (Landsman 2009; Leiter 2007; Tseng 2017)：課責家長以醫療凝視 (clinical gaze) 來審視孩子的發展軌跡，並在孩子落後時與專家共同承擔治療任務，務求最大化「回歸正常」的機會 (Leiter 2004; 曾凡慈 2010b)。這種對於「正常」的高度企望，不只來自早期介入系統原本就預設醫療模式的障礙取向 (視障礙為個人的功能損傷，需要矯治以趕上進度) (Leiter 2007)，家長們亦總是根據既有的文化論述來理解孩子有障礙的可能：在主流社會中，身心障礙經常被框構為足以吞噬個人與家庭的悲劇；但同時存在英雄式的進步敘事，相信孩子終能克服缺陷、取得成就 (Landsman 2003)。這些無論是在醫療領域內外的論述，無疑都立基於健全主義 (ableism) 的意識形態，將障礙視為貶值的存在狀態，從而是家長

（特別是母親）需要極力為孩子避免的未來（Landsman 2009）。也因此，一旦警示以身心障礙的風險，家長更容易為制度機構與專業社群所動員，他們的育兒實作，連同孩子本身，都成為持續被監看、管控，甚至改造的對象（Ryan and Runswick-Cole 2008）。

許多相關研究採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視角，透過論述分析來揭示各種育兒建議及其寫入的政策制度，如何構成一套支配性的論述體制（discursive regimes），藉由建構特定的童年與母（親）職意識形態，來確保母親能從事適當的育兒行為，以再生產符合新自由主義理想的公民（例如：Clarke 2014; Jensen 2010; McNaughton 2011; Murphy 2003; Salmon 2011; Wall 2013；陳婷玉 2010）。科學育兒成為一種遠距治理的工具，意即「透過生產專業知能與規範性的教誨，來導引主體的行動，以讓他們能治理自身」（Cooper 1998: 12）。是以社會對私密家庭的治理強度並未降低，只是手段從過去的意識形態灌輸以及社會控制機制，轉向「主體性的提倡、愉悅與抱負的建構，以及罪惡感、焦慮、羨嫉與失望的活化」（Rose 1990: 213），以將政治、社會或體制的目標，連結到個人的快樂與欲望，甚或自我的幸福與完整。而在這樣的論述體制中，童年特質或教養的影響被視為普遍性的自然事實或科學真理，母親則被配置特定的角色——接受專家建議來執行育兒任務，即便這些育兒知識本身經常帶著西方現代社會的文化預設，或是立基於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

近年來，愈來愈多的研究將焦點從育兒論述轉向親職實作，從而不再將母親視為支配論述的從屬者，而是呈現她們如何透過或是挪用這些論述，主動思考與自我定位，並發展相應的日常實踐（參見：Budds et al. 2017; Faircloth 2013; Geinger et al. 2014; Lupton 2011; Ryan et al. 2010；范代希 2017）。育兒論述從而成為自我的技術（technologies of self）（Foucault 1988），是發展母性認同（maternal identity）的部分素材。母親們據此評價與管理自身育兒行為，以符合特定論述體制下「好媽媽」的道德標準（Rose 1990；梁莉芳 2018）。藉由這種形塑主體的過程，一方面，專家所界定的適當養育

得以超越文本，進入私密的家庭空間付諸實現；但另一方面，自我技術的概念暗示著支配論述與個體之間存在更具彈性的關係（而非直接強加）。如同許多經驗研究發現，個人會在日常生活中以不符合論述所給定的方式來詮釋與實踐這些行為規範，即使並未採取全然反抗或拒絕的立場，仍體現了抵抗的可能性（Armstrong and Murphy 2012）。

這批探問親職治理的文獻，為後續的母職研究奠定深厚基礎，但仍有兩個欠缺之處。首先，很少正面處理論述本身的異質性。如果稍事觀察當代的育兒論述場域，很容易發現專家建議百家爭鳴，甚至傳遞彼此矛盾的訊息。這樣的異質性可能讓母親們陷入焦慮（例如：Craig and Scambler 2006），但也提供複數的主體位置，成為行動者持續協商自我認同與執行教養實作的資源。正如藍佩嘉（2014）的研究發現：台灣同時存在多樣的親職文化劇碼（cultural repertoire），新一代家長會反思自身的生涯軌跡（包含階級流動與遷移經驗），並依據與全球化教養價值的親近程度，以及本身所擁有的資本限制，撿選、混揉與重構出差異的親職論述與教養實作。本研究同樣發現，前述兒童發展研究中看似汰舊換新的育兒典範，同時並存於台灣早期童年的親職場域。但相較於藍佩嘉著眼於全球化與階級再製的連結，發展律令的提問則聚焦在母親如何協商異質育兒建議與專業權威來源，以探究規範論述與日常實作之間的關係。

既有親職研究的另一個欠缺，是經常只看到主要照顧者，忽略「育兒」必然發生在親子互動的脈絡中，孩子本身同樣有能力影響家長的教養行為（例外者如：Chin and Phillips 2004; Cook 2009; Goh and Kuczynski 2009）。尤其當孩子年紀愈小，似乎更難看見他們如何形塑親子關係與家長的育兒決定。只有少數像是 Julia Keenan 與 Helen Stapleton（2009）對英國新手媽媽的研究，呈現出母親的照顧實作如何受到嬰幼兒本身的回應所影響。她們發現雖然政府規定母親們要「依孩子需求」餵奶（feeding “on demand”），但媽媽們仍會因孩子的不同反應而調整實作，例如對「懶」得吸吮的寶寶改成定時哺餵，

孩子患有腸絞痛的母親也會提前餵奶以避免寶寶哭泣。本研究受惠於這樣的視角，希望揭示出從支配性論述到日常實作，並非母親單方向的應用，而是必須與孩子在育兒脈絡中共同協商的結果。

三、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首先是對 41 位正育有學齡前嬰幼兒的母親所進行的訪談記錄，內容包括孩子出生之後的日常照顧安排，發展過程中比較在意的事情或面向，以及相關的教養經驗。這部分材料來自研究者於 2008 到 2010 年間考察台灣兒童發展風險治理體制的部分成果。其次，使用與「發展」相關的關鍵字，在網路上兩大具代表性的親職論壇蒐集母親們的相關討論，資料收錄期間至 2018 年 10 月止；最後，依據這些訪談與網路書寫中母親們所提及的書名、專名家名，或是特定說法與概念，進一步蒐集相關文本，以豐富研究者對相關經驗的認識。易言之，本研究所提出影響當代台灣早期童年親職場域的幾種發展律令，並非先對市面上流通的育兒論述進行歸納整理，再探究它們如何被日常運用；而是從母親們的經驗出發，依據她們對孩子的發展關切與相關投入，向上追溯哪些論述形塑她們對這些發展面向的認識與實作。

受訪對象的選擇，是透過人際網絡介紹、滾雪球方法，再輔以立意抽樣，除了考量母親們社經背景以及居住地的城鄉差距，也刻意增加孩子曾被醫療體制警示有發展風險的受訪人數，理由在於孩子發展是否符合常規的差異，可能影響國家與專業介入親職治理的程度，也高度形塑母親們對發展律令的回應方式。⁵ 受訪母親多數有專兼職

5 而這樣的孩子在全體嬰幼兒人口中所佔據的比例，或許沒有想像中那麼低。例如在 2016 年衛福部執行的「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中，就發現育有 0-5 歲孩子的家長當中，有 23.2% 曾接受過醫生發展遲緩評估（雖然有問題的只佔 1.4%）。理論上，這個調查中的「發展遲緩評估」並非針對所有嬰幼兒的「發展診查」，而是針對已懷疑有風險孩子的確診程序。

工作，⁶ 只有 14 位自我認定是全職母親。在教育程度的分布上，3 位具國中教育程度，18 位有高中職或專科學歷，20 位則為大學或技術學院以上；居住地方面，16 位居於台北市以及新北市的板橋與中永和地區，新竹縣市與台中市母親則有 14 位，另有 11 位住在台南市邊陲的兩個農業鄉區。此外，41 位母親中有 17 位經歷過孩子曾被醫療體制警示有發展風險，包括早產兒、生產時腦傷、（疑似）發展遲緩（未達身心障礙程度），以及有其他臨界性發展議題（感覺統合失調、亞斯柏格、疑似過動與疑似注意力不足）。這些母親當中，8 位有大學以上教育程度，7 位具高中職或專科學歷，兩位國中畢業；有 6 位全職照顧孩子，3 位家庭自營生意，1 位打工，其他維持有專職工作。受訪者的詳細資料表，請參見文末附錄。

除了直接訪談育兒經驗之外，我也以消極使用者身分，在華文世界最大的電子佈告欄批踢踢實業坊（[telnet://ptt.cc](http://www.ptt.cc)）中的「BabyMother」看板，以及 BabyHome 寶貝家庭親子網（<http://www.babyhome.com.tw>）的「親子討論區」進行觀察，並依據研究過程中產生的關鍵字，進一步搜尋使用者發表的公開文章。首波的關鍵字是「發展」，再從這些檢索而得的內容進行分類與延伸搜尋（例如常與「發展」相連結的概念就包括認知、情感、社會能力、語言、動作與生活自理）。本研究認為，這些由母親們自主書寫，以分享自身經驗及尋求他人建議的育兒文本，可能比起與研究者進行正式訪談，更貼近她們的日常實作與思維。更重要的是，網路上以文字留存的即時互動記錄，更可以看出具有不同育兒經驗的母親們，如何針對特定議題進行意見交換甚至相互爭辯。即便網路使用者主要以文字符號為唯一溝通工具，可能偏向中產階級、大專以上學歷的背景，但仍不失為瞭解當代母親育兒經驗的重要門徑之一。

整體來說，母親們在日常照顧中對孩子的發展關切與實作，即便涵括各種發展面向，但新生兒階段還是高度集中在發展孩子的情感依

6 其中六個家庭自營生意，兩個打工，一個是作家。

附，或讓孩子即早適應成人主導的家庭生活。大概一兩歲之後，富有教育意涵的活動開始明顯增加，雖然不少人強調要從「零歲開始」。易言之，比起語言、動作與自理技巧的發展通常只要達到常規就不會被太過在意，孩子的認知、情感與社會能力的提升與強化，更吸引母親投注心力。與此同時，還有另外一類發展上的關切與投入，不在於追求各種優化，而在確保正常，特別強力地影響那些孩子被認為有發展疑慮的母親。本研究據以建構四種發展律令，先在下一節進行分述，再接續討論母親們如何進行相關的日常實作。

四、強化嬰幼兒早期發展的四種律令

雖然在發展科學的研究中，對於「早期」童年所指涉的年齡為何有著紛歧的界定，⁷但整體而言，它所衍生的發展律令聚焦在嬰幼兒時期，並且會隨著不同能力所對應的發展關鍵期（可能是複數的、也可能彼此重疊），在不同年（月）齡階段有專屬的育兒建議。易言之，這些律令立基在發展觀點與生態取徑，意即強調成長中的孩童（the growing child）與脈絡影響的時機（timing of contextual influence）相互為用，不再是天性與教養非此即彼（Britto and Pérez-Escamilla 2013）。家長被鼓勵「吸收最新、最重要的嬰幼兒發展常識」，以免「錯失關鍵期教養方式的配合，可能因此影響孩子的一生」（林佩蓉 2007: 4）。

然而，雖然嬰幼兒的發展已有常規，什麼是最適配的教養模式卻未必一致。本研究區分出四種形塑台灣早期童年照顧的發展律令，分別命名為：情感依附、社會適應、大腦開發，以及正常性。它們各自連結對嬰幼兒本質的特定想像、某種行為表現或存在面向的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s）、所立基的科學權威、所建議的育兒或照護技術，以及母親被預期的角色，並且透過不同的傳遞管道播送給家長，

7 起點從出生或前推到受孕時，終點則是從兩歲、三歲、五歲、六歲，甚至到八歲不等。

表 1 四種發展律令

	嬰幼兒 特質	問題化	科學權威	技術	母親角色	主要傳遞管道
情感依附	能表達需求的主體	情感需求與滿足	依附理論	親密育兒	回應者	育兒書、網路、醫療體制
社會適應	依後天磨塑的客體	行為表現與作息	行為主義	規律訓練	主導者	育兒書、網路
大腦開發	無限可塑性的大腦	認知與多元智能	神經科學	豐富環境	教育者	育兒書、網路、幼教與商品市場
正常性	有異常風險的身體	發展程度落後	早期介入	發展監管與療育	專業協力	醫療體制、國家監管系統

期待他們在日常育兒實作中適切遵循（表 1）。以下將漸次說明。

情感依附的律令是基於依附理論而建構的早期照顧建議，主張嬰兒是具有需求並能積極表達的主體，母親的責任就是學習解讀孩子傳遞的訊息，並透過適當回應來滿足，以達到發展安全依附的目的，進而影響孩子成年後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以及維持終身的心理健康。這套理論以「依附教養」（attachment parenting）之名，在 1990 年代初期由美國兒科醫師與護理人員 Sears 夫婦撰寫成育兒指導書籍，建議母親們應哺餵母乳、辨識與回應嬰兒的需要，並盡可能增加與孩子的身體接觸——白天揹在身上，晚上同床共寢。Sears 夫婦的育兒指南很快成為國際母乳會（La Leche League）最親近的論述之一，也在 1990 年代發展成全球性的支持父母實作網絡（Faircloth 2013: 97）。

在台灣，母嬰依附的理念正是基於母乳哺育的公共倡議，以及母嬰親善醫院的制度性實踐（例如：葉錦雪 2015；賴亞伶 2009），日益在體制性的新生兒照顧場域取得支配地位。而在私己家庭中，則隨著 Sears 夫婦著述的育兒手冊在 2000 年譯為《The Baby Book：親密育兒百科》（Sears and Sears 著、張嘉倩譯 2000）（以下簡稱《親密》）正式發行，很快接合當代台灣親職場域中盛行的「純真童年」與「失落童年」敘事（藍佩嘉 2014），成為特別是中產母親們積極

踐履的實作指南。許多媽媽會回溯成長過程未曾與父母建立親密連結的經驗，從而希望藉由發展與孩子之間的情感依附，來彌補自身的童年缺憾。最典型的例子是在 BabyHome 網站上，一位具醫護背景的親密派媽媽先自述「我們如何教養小孩（或是說我們『想』如何教養小孩），與我們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關係」，並以「讓我們跟著孩子一起重新體驗一次童年」、「健康的依附不僅讓孩子身心健康，對父母更有治療的效果」來總結自己對所謂「親密育兒」的支持。⁸

回到美國脈絡，Sears 夫婦提出的依附育兒取向，其實是為了反對二十世紀上半葉流行的、強調建立嚴格時間表的嬰兒照顧方式（Sears and Sears 2001: 4）；但在台灣，這兩套論述則是接續著傳入，後者藉由旅居國外作家林奐均（2006）出版《百歲醫師教我的育兒寶典》（以下簡稱《百歲》）吸引了另一票母親追隨。該書所尊奉的「百歲醫師」為 1930 年代初期開始行醫的美國兒科醫師 Leila Denmark，在當時行為主義心理學蔚為主流的影響下，她深信「人一生會走什麼方向，大多取決於出生後到童年時期受到的訓練和引導」，因此父母應該為孩子建立一套系統，並訓練孩子適應，以作為未來「人生之道」的基礎（Bowman 著、許惠珪譯 2016: 5, 8）。相較於《親密》強調母親跟隨嬰兒的引導以發展情感依附，《百歲》看重的其實是家長應讓嬰兒學習「社會適應」。這裡所指的「社會」，對於嬰孩來說正是由成人主導的家庭。為了讓嬰兒能夠遵循家裡的生活規範，Denmark 醫師要求父母首先認清「是你們搬進去跟寶寶住，還是寶寶搬進來跟你們住？」並強烈建議在嬰孩出院回家後「立刻培養寶寶適應家中的作息」（林奐均著、許惠珪譯 2006: 26）——白天固定四小時喝奶，晚上無需陪伴安撫，就能獨自入睡到天明（必須在六個月內訓練完成）。如果嬰兒抗拒哭泣，父母也不該立刻回應，以免孩子學會自我中心、依賴大人，甚至「用哭聲來控制父母」。

8 參見 shenc1519，2010 年 6 月 19 日，〈解開您對《親密育兒》的誤解〉。BabyHome 親子討論區／育兒經驗／母乳哺育版（<https://forum.babyhome.com.tw/topic/3108068>，取用日期：2018 年 6 月 15 日）。

雖然常被主流心理學甚至醫療專業人士暗示為「過時」的教養觀念，甚至書中關於讓嬰兒哭到入睡（cry it out）、制定嚴格時間表，以及臥睡等主張屢受批評，《百歲》一書上市至今依然熱賣不斷（至 2017 年已超過一百刷，出版社甚至推出「10 年慶功版」），更催生出好幾本由不同作者執筆，同樣尊奉「百歲醫師」之名的實作經驗書，足見這套論述在台灣嬰幼兒照顧場域的實質影響。究其原因，或許是因為接合華人社會仍具影響力的傳統嚴教觀（林文瑛、王震武 1995），或是恩威並濟、高要求與高回應的「開明權威」（authoritarian）管教取向（陳富美 2005）。這種主張家長責任、尊卑有序的親職規範，不僅深植在國家主導的親職教育（Lan 2018: 33），也反映出現實生活中不少人認可的親職價值。2014 年對教養行為的調查就發現，育有 3-5 歲孩子的家長中，約四成五的人同意「孩子的管教要嚴」（衛生福利部 2016）。即使是針對 0-2 歲孩子，仍有高達四成的支持比例。⁹

另一套主要針對孩子認知發展的育兒建議，則是課責家長應盡力追求幼兒的「大腦開發」。這套律令始於 1990 年代以來科學育兒領域的新進展，「新大腦研究」不斷更新嬰幼兒照顧的專業建議（Macvarish 2016），也透過各種傳播途徑重塑家長在早期童年的育兒實作（Romagnoli and Wall 2012; Wall 2010）。這些轉譯自神經科學研究的育兒新知，反覆告訴父母：「零到三歲是腦神經細胞突觸增加最快速的時期」，父母只要能把握這個「孩子的學習關鍵期」提供「豐富的環境，便能有效提高孩子的智商」（信誼基金會 2004: 5）。如是許諾不只讓孩子從初生（甚至受孕）之始就成為可教育（educable）的對象，更讓許多家長落入深刻焦慮，惟恐少做一點就會擔誤孩子的大好前景。

在台灣，這套強調大腦開發的育兒論述，首先以各種嬰幼兒教

9 即便支持的比例與家長教育程度成反比，但在碩博士父母中還是有高達 39% 的受訪者表達同意。

育書籍或雜誌文章的形式登場。例如號稱「日本右腦教育之父」七田真的相關著述，自世紀之交引入之後，很快在出版、幼教與大眾媒體上刮起旋風，將台灣父母原本就注重教育投資的傾向往學齡前推進；近期則有頂著兒童發展專家頭銜的職能治療師王宏哲，以「腦科學育兒法」為名著書立說，並販售相關課程給父母和孩子。與此同時，大腦開發論述比前兩套律令更緊密嫁接進學前教育與娛樂市場（Smyth 2015），轉化成市面上琳琅滿目盡是標榜發展右腦、左腦或是全腦的影音產品、玩具、教材與課程（例如胎教音樂與相關商品、嬰兒黑白圖卡、閃字卡、美語 CD、幼兒才藝教室、雙語托兒所……等等）。聲勢之盛，就有人形容是「排山倒海全面入侵新手爸媽的生活」，將父母捲入「瘋大腦」的狂流中（李宜蓁 2010）。家長彷彿只要購買這些「儀式性魔法」（ritual magic），就能讓「正常」嬰兒搖身一變成為理想的、事業型的主體（entrepreneurial subjects），為未來成就打好根基（Nadesan 2002）。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試圖在孩子任何發展面向上累積優勢的努力，無不以擁有正常身體為前提。只是這樣的預設在健常主義社會太過理所當然，唯有注意到台灣自 2000 年代開始，就對每個孩子的早期發展部署一系列的制度性監管（包括新生兒篩檢、早產兒追蹤，以及六歲以前共七次結合預防保健的發展診察與評估，十三次配合托嬰中心與幼兒園執行的發展篩檢），方能凸顯出「正常性」律令對於早期童年發展場域的重要性。而隨著監管網絡的擴張，台灣家長日益確立對「嬰幼兒早期發展有標準化常規可測度」的認識，以及對「發展落後」逐步形成風險意識。與此同時，政府針對這些發展風險孩子提供早期療育服務，並不斷透過「早期童年作為發展黃金期」，「關鍵期介入的成效遠勝於日後療育」，「愈早開始孩子就愈有機會回歸正常」等修辭，以徵召家長的積極協作，要求他們積極監控與管理孩子的发展風險，並在必要時接受專業介入，學習正確的親職技巧來協助孩子追趕發展進度，以確保孩子的正常性（曾凡慈 2008）。

相較於前三種發展律令著眼於特定面向的「優化」，且實現程度

不易精準驗證，正常性律令則是全面性的，隨年齡進程有標準化的里程碑可做為考核依據，¹⁰ 並且是以確保「正常」為目的。爰此，正常孩子不只是家長被期待的私己教養任務，國家也透過制度配置，期待藉由降低孩子身心障礙的風險，以減輕未來的社會福利支出。一旦孩子發展進度明顯落後於常規，就不再專屬家庭內部教養的權責範圍，而會被轉進早期療育體制，視之為重大疾病或身心障礙的癥兆，需要衛生福利體制的即早介入，並課責家長承擔專業協力的角色，以讓落後的孩子盡可能回歸發展常軌。

同樣作為規範親職實作的發展律令，「正常性」無疑比其他三種類型有著更高的普及率與強制性。透過幾乎涵蓋全部嬰幼兒人口的監管體制，與強調發展遲緩兒童應接受早期療育的衛教資訊，持續提醒家長：孩子的發展程度應該受關注，正常性需要被保證。台灣對於身心障礙的污名，以及依賴個別家庭以私化照顧責任的現實，加劇了父母投入早期療育以避免遲緩孩子最終成為障礙者的迫切性。相對上，大腦開發的律令則更多是透過商業媒介，助長父母期盼子女成為人中龍鳳的傳統欲望。即便家長的消費能力取決於自身的經濟條件，卻都無可免於市場勸誘的聲音，也總有不同價格帶的商品可購買，作為提增孩子各項能力的工具。至於攸關情感依附與社會適應的發展律令，由於主要是透過教養書籍，相對上更容易觸及中產母親。她們比勞動階級的媽媽更親近科學育兒的論述，擁有並願意投注資源在認知能力之外的其他發展面向，尋求專家建議來追求優化的實作。¹¹

然而，也正因此，中產母親更易受到密集母職文化規範的影響，

10 例如以台灣家長人手一本的《兒童健康手冊》為例，6 到 8 個月的孩子應該能達到的各項指標為：稍加支撐就能站得很挺、會翻身、會伸手抓取身邊的玩具、會拿開蓋在臉上的手帕、呼喚小名時會朝聲音方向轉頭，以及會發出像是「ㄇㄚ」、「ㄅㄚ」、「ㄅㄚ」等不具意義的聲音。家長被期待在帶孩子進行健康檢查之前，先行填答孩子是否已經達到這些發展題項，再交由醫師評估。

11 我所訪談的勞動階級或低階白領媽媽，很少人為了新生兒照顧而特意去閱讀《親密》或是《百歲》等書籍（只有一位），大部分靠長輩或同輩親友傳授經驗，或自己成長過程中曾協助他人照顧孩子。就算看書也多是雜食性地閱讀育兒雜誌。雖然這些媽媽大多認同孩子需要「（適度）管教」，但多來自傳統教養觀念的影響，而非專家強調規律訓練的嬰幼兒照顧建議。

尤其這些育兒建議動輒透過激發焦慮、罪惡感或使用道德譴責等修辭策略，以確保母親的順從。職此，優化孩子發展的律令，強制性總來自於社會上既存的母職意識形態，並透過發展科學更加擴充其權責範圍，藉由強調早期童年來設定更加緊迫的時限感。母親終歸必須為孩子負責，從身體健康、人格陶冶、心理福祉，甚至到智能表現。當這些律令以科學權威之名，羅列出具體的教養建議（或可購買的服務與產品），愈發鞏固既有的母職迷思：宛如母親可透過無保留的愛、不懈地付出，以及專家轉授的精細育兒技術，就能控制子女的發展結果與確保未來人格與成就。

最後，這四種律令並非各自獨立，而是以不同方式彼此關聯（參見下圖¹²）。首先是特別著力在嬰兒階段的情感依附與社會適應兩種發展律令，前者強調親子間的親密關係，後者看重孩子表現符合外部常規，並且幾乎在所有的育兒技術上都針鋒相對。這兩種律令與強調大腦開發的律令各有交會，但互為助力的程度則不一：例如有研究者發現近期的育兒論述已重新將親密依附的重要性理解為促進大腦中情感與自我調控迴路發展的關鍵（Wall 2018）；而著眼於社會適應的家長，亦相信嬰兒有規律且充足的睡眠對腦部發展有益，但經常得面對「哭到睡」的做法是否造成嬰兒壓力而有害大腦的批評。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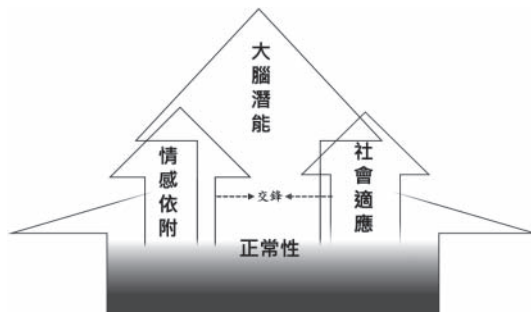


圖 1 四種發展律令的關係示意

12 這個圖的表現方式受惠於研究助理郝天行的創意，特此致謝。

13 例如：hsien，2010年5月16日，〈讓寶寶哭是否會影響腦部發育〉（<http://ihsienh.pixnet.net/blog/post/314802074-讓寶寶哭是否會影響腦部發育>，取用日期：2018年6月15日）。

另外，這兩種主要作用在嬰兒階段的發展律令，也會透過各自對於兒童本質與親職角色的預設，差別地形塑在幼兒階段更顯重要的大腦開發之實作風格。畢竟依附關係的建立，原本就有賴於肯認孩子主體地位，以及低度要求但高度回應的寬容教養（permissive parenting）方式，而親近這種兒童觀與教養價值的母親，同樣會傾向免於壓力與強制，透過遊戲形式來啟發嬰幼兒的多元智能。相對上，社會適應的主張預設孩子不見得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需要家長負起引領責任，為孩子鋪設人生之路。這樣的兒童觀認可家長應主動訓練孩子以強化其能力的教養價值，較親近把握黃金期為孩子開發認知能力以利於未來競爭的論述取向。這顯示出發展律令並非獨自存在於親職場域，亦會與其他在台灣同樣具影響力的教養論述相互影響。

至於正常性律令，則是與另外三個律令彼此構成。一方面，正常性的達標不只考量孩子在生理與動作面向的發展，亦有賴於社會適應、情感依附，與認知表現等各方面都能符合相應的年齡常規；另一方面，正常性也是追求發展優勢能力（無論哪個面向）的基礎。只是當孩子的健常狀態看似無虞，它的重要性便經常被視為理所當然，以至於隱而未見。然一旦孩子被認為有發展風險，無論是在情感、社會性或是智力面向落後，都需要家長強化與孩子的親密互動、行為訓練，或提供認知刺激。這些親職任務事實上與追求發展優化的實作並無本質不同，只是在專業介入程度與強制性上有所差異。接下來，我將討論母親們如何在日常育兒場景中回應這四種發展律令。

五、「情感依附」與 「社會適應」的戰事

無論是根據訪談或網路育兒文本所示，選擇從嬰兒初生之始就投入親密育兒的母親，經常是基於認同這套發展律令所預設的寶寶「本質」（從而「需要」什麼）與許諾的親子關係。這些自封「親密

派」的媽媽，深信嬰兒是有情感需求的主體，哭是他們的表達工具（並常強調是「唯一」的），父母的任務就是提供即時回應，特別是在剛出生的前幾個月，應「毫不遲疑地滿足他的需要」（Sears and Sears 著、張嘉倩譯 2000: 8），以給孩子穩固的安全感和信心。這種情感依附的發展，被認為「是促進大腦發育最有效的因素」（Sears and Sears 著、張嘉倩譯 2000: 16）。而即使未曾真正讀過《親密》一書的母親們，亦可能從其他來源吸收到相關資訊，例如網路、親友，甚至是醫院的護理人員。就有網友提到產後出院時，護理師特別交待「寶寶年紀還小……非常需要安全感，能抱就抱，滿足她的安全需求，長大之後心理上才比較不會有缺陷」。¹⁴

然而，為了確保嬰兒發展出穩固的情感依附，主要照顧者需要投入高強度的時間、情緒與體力。因此不意外的是，奉行這項發展律令的多數是中產階級全職母親。至於那些白天有工作的親密派媽媽們，如果又遇上所謂「高需求寶寶」，必然加倍辛苦。獨自與母親同住的受訪者芳慧，回想女兒初生時的照顧經驗，簡直無法想像「那時候我到底是怎麼活過來的！」即使在懷孕時就知道親密派的作法很消耗心力，卻認為：「我很累沒關係啊，能為小孩好就好了」。結果沒預料到孩子：

可能就是書裡面講的「高需求」的小孩……就一直快到兩歲、到一歲十一個月斷奶前，都是晚上都要起來三、四次。

（問：為了喝奶？）對啊，然後喝，就咬著不放。然後把它拔出來，她就醒啊。要不然就是常常就是哭哭哭，然後我只好坐著，因為她就要立著（按：指孩子只要直抱，不願被平抱），我就坐著睡這樣子，抱著她坐著睡。然後第二天早上又要去上班。下班回來就是又要處理家裡的事情，弄弄弄，

14 參見 beata 回覆 carpfish，2016 年 2 月 4 日，〈Re: [寶寶] 親密派與百歲派的掙扎〉。批踢踢實業坊，BabyMother 版（telnet://ptt.cc，取用日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

我媽去睡覺，把房門一關，我就上大夜班，就是這樣。日復一日這樣都沒有休息，就很恐怖。

挾帶著高強度的、以孩子為中心的母職要求，情感依附的發展律令與強調規律訓練嬰兒達到社會適應的育兒取向，在許多面向上都給出完全悖反的詮釋與建議，遂在台灣育兒場域中掀起「親密派」與「百歲派」戰事：例如嬰兒是剛出生什麼都不懂、需要被教導的客體，還是什麼都懂只是不會表達、需要被同理與回應的主體？哭了就抱是在滿足需求還是培養依賴？哭了不抱是訓練獨立還是忽略虐待？寶寶的安全感，究竟是來自於信任父母會即時回應他們發出的訊號，還是學到父母會為他們設下界線，自己只需要遵循就好？

相較於親密派媽媽認同早期童年對於情感滿足的需求，也渴望與寶寶間的親密關係，強調社會適應的媽媽們，同樣是受到發展律令中寫入的親子互動腳本所吸引，相信孩子需要接受成人引導來適應外部秩序，因此家長必須設定界線並訓練嬰兒遵循。而既然對於發展律令的接納深受母親本身的親職價值影響，¹⁵ 育兒方式的選擇便不免具有道德意涵。兩派支持者動輒在網絡論壇中擦槍走火：親密派指責百歲的做法「自私」且「殘忍」，「不願為孩子犧牲」；百歲派則反擊親密育兒是「溺愛」和「寵壞孩子」，無法讓孩子養成獨立人格，「才是真正的殘忍」。¹⁶

雖然兩套論述看似都有醫療專家背書與科學權威加持，但由於情感依附的律令主張更符合當代優勢的密集母職意識形態，看重社會適應的家長經常需要進行額外的認同工作（identity work）（Faircloth 2010a），以回應那些被警示的風險與對母親的道德譴責。例如奉行

15 當然除了母親本身的價值與發展律令的契合度之外，「可行性」也是影響她們選擇的因素之一。例如高學歷的允文就認為親密育兒主張完全以嬰兒為中心的方式「成功率太低，你很容易就沒有辦法做到」，反而會對許多媽媽造成壓力並且「覺得 guilty」，而訓練獨自入睡的主張，也要有空間可以和嬰兒分房比較容易成功。也有其他媽媽認為只要跟長輩同住，就不可能放小孩一直哭而不會受到干預。

16 例如：redmoon39，2011 年 7 月 8 日，〈[寶寶] 我是百歲媽媽〉。批踢踢實業坊，BabyMother 版（telnet://ptt.cc，取用日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

睡眠訓練的媽媽堅稱「除了睡覺時間以外，我們百歲媽媽會常常抱寶寶的啊……有誰可以忍受不抱寶寶呢？」¹⁷ 這樣的陳述，意圖說明她們並未悖離高度情感灌注的母職規範，只是「寶寶哭不立刻抱，而是先觀察需求，然後適度滿足」，甚至反擊親密派的作法：「寶寶一哭就餵奶／抱抱，這就是正視寶寶需求嗎？」此外，有些媽媽還會重新定義取得發展益品（developmental goods）的手段，例如主張孩子「能自行入睡而不依賴父母，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安全感。」¹⁸ 或是以長期觀察的「後果」來論證所謂「風險」並不存在，例如讓孩子哭到睡的媽媽舉證「我的寶寶越來越愛笑了，完全不覺得有心靈受傷的樣子」、¹⁹ 「每天都睡飽吃好，睡醒不會哭都是笑瞇瞇地等媽媽來抱他，情緒穩定」，²⁰ 甚至整體發展狀況「剛好都比我身邊朋友的孩子快一些」。²¹

道德的譴責不只發生在遵奉不同發展律令的家長之間，當同一位行動者持續吸收新的育兒知識，反身性地檢視與重新評價自己的實作，也可能發生「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責難。例如受訪者芳慧在有了第二個孩子之後，覺得自己之前實作親密育兒時對孩子「太放任」，反過來想幫新生兒設定作息規律：

（書上）是說其實這樣對小孩比較好，小孩他喜歡秩序感，他也希望可以預料再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而且它講的一個最讓我覺得害怕的是，它說如果每次小孩子哭你把他

17 mavisQ，2015 年 8 月 12 日，〈R: [寶寶] 訓練睡過夜？（回應百歲部分與建議）〉；亦可參考 Nanami24，2007 年 12 月 15 日，〈Re: [問題] 也是百歲〉；又或是 wawacutie，2014 年 3 月 12 日，〈[寶寶] 訓練寶寶半百歲規律作息我的心路歷程〉。批踢踢實業坊，BabyMother 版（telnet://ptt.cc，取用日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

18 Ctfisher，2008 年 5 月 25 日，〈Re: [閒聊] 百歲育兒法〉。批踢踢實業坊，BabyMother 版（telnet://ptt.cc，取用日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

19 Nanami24，2007 年 12 月 15 日，〈Re: [問題] 也是百歲〉。批踢踢實業坊，BabyMother 版（telnet://ptt.cc，取用日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

20 mavisQ，2015 年 8 月 12 日，〈R: [寶寶] 訓練睡過夜？（回應百歲部分與建議）〉。批踢踢實業坊，BabyMother 版（telnet://ptt.cc，取用日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

21 Karina，2007 年 12 月 18 日，〈Re: [問題] 也是百歲〉。批踢踢實業坊，BabyMother 版（telnet://ptt.cc，取用日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

抱起來，妳是剝奪他學習的能力。就感覺說我不但沒有對他好，而反而讓他喪失這個機會，是我剝奪他。妳不會覺得這種想法真的是很恐怖？……你就覺得，阿，我小孩永遠沒有這種能力！對，就會開始緊張。

芳慧所引述的這種單向歸因模式——「母親錯誤選擇」導致「不當照護行為」造成「受害的孩子」，示現出育兒論述中長期存在的「譴責母親」（mother-blaming）意識形態。這種修辭策略，不但用以說服個別母親服從科學醫學專家建議，否認自己對於孩子的直覺與判斷，也內化成為她們自我評價的道德準則。

而在這場十餘年來不曾間歇的社會適應與情感依附的發展論戰裡，個別母親的「改宗」或許比想像中更頻繁。除了其他家人或親友網絡中的教養觀念可能重塑母親選擇之外（曾凡慈 2010a: 第四章），嬰兒本身其實是不下於母親的重要行動者，任何育兒方式的穩定化，必然是彼此協作之後的產物，即使仍出自母親對孩子「行動能力」的建構、理解與適應（Keenan and Stapleton 2009）。特別是要執行社會適應的發展律令，更仰賴嬰兒的合作，即使論述本身強調成人的主導地位（例如有網友就堅稱「沒有不能百（歲法）的孩子，只有不能百的媽媽」²²）。但在實作場景中，畢竟不是每個嬰孩都能在短時間內適應大人設定的規矩，不乏有寶寶直哭上好幾個小時，甚至出現吐奶、失聲、臍疝氣或屏息等反應，來抵抗家長不抱不哄的決心。²³ 因此，除了許多一開始就認同情感依附的媽媽之外，可能有同樣多的追隨者，其實是百歲失敗後轉向親密論述的案例。反過來說，也必然有原本渴望實現以孩子為中心，卻不堪嬰兒的高度需索而轉向

22 參見mavisQ，2015年8月12日，〈R: [寶寶]訓練睡過夜？(回應百歲部分與建議)〉。批踢踢實業坊，BabyMother版（telnet://ptt.cc，取用日期：2018年10月15日）。

23 當然網路上仍有媽媽能忍受孩子哭上三個小時，最後終究訓練成功的案例。參見BabyHome討論串〈實施百歲的媽媽，10天真的會好轉嗎？你們都讓寶寶哭多久〉（<https://forum.babyhome.com.tw/topic/3548535>，發文日期：2011年6月30日；取用日期：2018年6月30日）。

管理孩子的作息。

這些歷經失敗而改宗的故事，突顯出全稱性論述與個體實作之間的必然落差。而對於這種落差的意識，經常是勞動階級母親解釋自己何以疏離於專家育兒建議的原因。例如高職畢業的筱清就覺得「每個小孩子多少都會有一些差異性」，育兒書「都太理論」，「講是一回事，可是真的要去做的話，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而那些「看很多書」的中產媽媽，通常也能在實戰受挫後認識到必須將孩子個體性納入安排育兒實作的考慮。網友 dance2 在作息訓練失敗之後，決定「順其自然，摸索一下我跟嬰兒之間能夠和平達成的共識在哪，而不是摸索我跟教科書的教養共識。」²⁴ 前面提到芳慧企圖規訓次子的行動，也受到孩子的極力抗拒。她嘗試了另一本書中被網友暱稱為「腰斷法」的育兒技術，希望能兼顧孩子的安全感與發展自我安撫入睡的能力。具體的施作方式為：孩子哭了先等五分鐘再抱起來，不哭了就放回小床，又哭的話再等五分鐘後抱起來，不哭了再放下，如此重覆到孩子能在床上睡著為止。然而不幸的是，在歷經重覆抱起放下、抱起放下的拉鋸之後，孩子依舊哭到讓芳慧決定放棄。她批評書中寫的根本像是「巫術」：

有點像在外面賣藥的那種，……就是怎麼樣可以訓練，那個怎麼樣做，來來來，你只要拿這個去貼，貼上去就怎麼樣，就 OK 這樣。……可是問題是，狀況跟他形容的總是不一樣，對啊，就覺得你就是隨便寫一寫，……可能就讓我感覺像是個廣告，他只是講得就是很精確，讓媽媽看了就是很焦慮。……然後我真的覺得，第三天，我就完全不想再去想這件事，我只想好好的看著他的臉，然後，就是恢復我們自己的那種步調。雖然不是很規律，但是，我覺得我們兩個都還很滿意這樣子。這樣就好了。

24 dance2，2008 年 11 月 2 日，〈Re: [推薦] 超級嬰兒通：天才保姆崔西的育兒祕訣〉。批踢踢實業坊，BabyMother 版（telnet://ptt.cc，取用日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

六、追求「大腦開發」

當家長熬過相對混亂的新生兒時期，隨著孩子清醒的時間愈來愈長，也對外界互動更有反應，家長便開始面臨新的育兒要求。²⁵ 本研究確實觀察到，許多媽媽們會在日常教養中納入大腦開發律令所鼓勵的育兒方式，儘管並非每個人都使用「大腦語言」（brain talk）（Mantilla 2015）來明確陳述這些實作的動機與目的。對這些媽媽來說，圖（字）卡、觸摸或有聲書、繪本、音樂 CD、拼圖、積木，或是按照孩子月／年齡編排的學前教育雜誌，幾乎都已是育兒生活中的基本配備；而特別是針對三歲以前的幼兒，與其說是期待小孩能獨自利用玩具或教具來自我學習，不如說是媽媽們藉此創造與孩子互動的情境與機會。就像幸安表示自己從孩子六個月大就很常唸故事、唱歌，畢竟「很多書裡面都會提倡說，你（要）多跟小孩子說話」，可是「他那麼小，你也不知道要跟他講什麼啊！（大笑）」另一位米夏也強調，即使小孩看似沒有明確反應，還是需要「受刺激，不能把小孩子丟在旁邊，其實要多跟她互動」：

妳推她出去的時候，比如說妳要過馬路，妳就說：「妹妹我們要過馬路囉！那我們要過馬路要注意車喔！」就是這樣跟小孩子講，其實小孩子長大以後她就知道，只是那時候她不會回妳。

易言之，為了優化孩子據信有無限發展潛能的大腦，母親們被強烈建議要多跟孩子密切互動，還要讓孩子有多樣化的經驗，不宜成天限制在固定空間，以營造有益發展的豐富環境。這樣的要求確實加

25 當然也有不少媽媽們會從新生兒期開始刻意提供增強物，例如在嬰兒床旁放置黑白卡、播放古典音樂，都是新生兒時期常被使用的道具。至於說話、唱歌、互動，也被認為是刺激發展的基本手段。

重了育兒的勞動內容，特別當有兩個以上的孩子時，母親們便經常在有其他照護者可分擔的狀況下進行育兒分工，但各自負責的內容卻不見得有既定的階序形式，²⁶ 而是會受到媽媽本身對於孩子發展階段與著重面向的差異詮釋，而形成不同的模式。例如同時育有三歲女兒與六個月兒子的明宜就說：「其實我請育嬰假就是為了帶大的……因為我覺得小的話，現在目前都是生活方面的東西，比較沒有那些知識或是習慣的那些東西，所以我大部分就給（自己的）媽媽帶。」她自己則忙著為大女兒講故事、上親子律動課程，並且會根據兒童發展知識，規畫各種學習或增加生活經驗的活動，例如參觀動物園、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到商店練習買東西等等。相對上，也有受訪媽媽則認為孩子在一歲之前是發展安全感與親密性的關鍵期，在這個時期的照顧工作不能假手他人，寧可把較年長、可溝通的孩子交給次要照護者分攤。

而當提到為孩子營造豐富環境，總是會考慮不同家庭的社經地位並非齊等，必然形成差異的實作方式。然而本研究發現，那些經濟條件較不利的媽媽們，並未能隔絕於大腦開發律令的影響，少數人也會運用各種創意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勉力實踐（類似發現可參見：Romagnoli and Wall 2012）。例如高職畢業、住在鄉下地區的全職媽媽秀惠告訴我：孩子兩三歲的時候是大腦「開始發育」的「黃金期」，應該把握這個時間把孩子教好，「就不會輸在起跑點上」。我請她描述自己的實作方式，發現秀惠即使用詞不如其他中產媽媽精緻，但她所敘述的其實所差無幾，都是盡量讓孩子自由探索並從中學習，且不以自己的方便來限制孩子。秀惠也經常說故事，還強調要用「誇張」的方式來「引誘」孩子注意，並且「講到什麼就跟他們一起跳舞」。而當我以為她是跟孩子共讀繪本時，她解釋：

我沒有買書，他們會破壞掉，他們不會珍惜說，因為小孩子

26 可對照藍佩嘉（2008）對於女雇主與家務移工之間分工的觀察。

他們不懂得珍惜，他們不懂得保存，好好用，他們都不會啊，愛惜他們都不會，對呀。所以你這時候買，只是多浪費錢，倒不如就是自己去亂編什麼故事，把你所知道的全部串連一起就很好玩，就是遊戲中慢慢的跟他們溝通，就問說你們要不要學小紅帽啊，還是你要變大野狼啊，你要當壞人嗎？

相較於秀惠即使物質資源的提供有限，還是費盡心思引導孩子，有些勞動階級的媽媽們則是自認「不會教」，因此更傾向將這部分的發展任務外包（例如讓孩子讀私立幼兒園）或不惜「下重本」購買超過自己經濟能力的教育商品。對她們來說，一再地從大眾文化接收到早期發展重要性的論述，又不認為自己具有教導孩子的能力，致使他們很難抵禦那些主打「潛能開發」的商業產品。高職一畢業就奉子成婚的雅婷，成為全職主婦又受婆家嚴格的經濟管控，每個月只有三千元零用金。為了把握孩子「大腦最好的時期」，也認為「現在任何公司英文都是最基本的」，雅婷瞞著全家人，以每個月分期付款兩千四的方式，為孩子買下約十萬元的美語教材，差點引發家庭革命。同樣高職畢業的全職主婦思佳，也認為送孩子上私立幼稚園太花錢，遂購買將近七萬元的類似商品，費了足足三年才繳清分期。然而，昂貴教材的使用效果卻讓她覺得失望：

還是一樣我們大人要教啊。他們就是說，你就放下去讓她們去聽阿，無形之中它會刺激啊，會刺激她這樣子。……結果還是～花那一些錢乾脆讓她去讀幼稚園。（問：不然那一套你是怎麼用？）像我買那一套，你就是她睡覺的時候你就放給她們聽。她們在玩，你一樣是放著讓它們走，她們的腦袋會去收，收集很多音，那個頻率。（問：那個時候你就這樣放給她聽嗎？）有，一陣子而已，然後發現說她們不是在這邊玩而已，一下子她們又跑出去了啊，浪費電啊。如果她們

都在這邊，像我們如果住公寓，她不會跑出去，ok，她怎麼跑就是在這個範圍，她的腦袋被刺激到。但是你像她出去，根本就沒有聽到什麼刺激，對，所以就一下子而已。

至於經濟能力過得去的勞動家庭，或是低階白領工作者，不少媽媽們帶著些微驕傲表示自家小孩兩歲多就認識 ABC（媽媽利用學前教育雜誌來來教導，或讓小孩看教英文單字的卡通），三歲送雙語幼兒園，四歲多就開始唸九九乘法和《三字經》。有意思的是，她們大多否認自己有特別著力經營（有媽媽還反問：「一般家長不是都這樣？」），也會批評某些藝人從孩子幾個月大就去上潛能開發課程是「不需要」且「浪費錢」，應該「讓他們有點小孩子的空間」。換言之，這些家長的育兒安排即便呼應早期童年階段的大腦開發律令，他們仍同時面臨社會上對於童年與親職的不同建構，最明顯的就是父母有責任讓孩子享有免於壓力或強制的「純真童年」（可參見藍佩嘉 2014）。本研究發現，這種論述在孩子的早期童年階段比起學齡時期更具支配性，使得部分看似致力於開發幼兒認知、提早為孩子進行學術準備的家長，仍會在訪談中強調她們只是在幫孩子「培養興趣」，沒有強求學習效果，只是「學一學」、「至少有印象這樣就好」。

至於光譜另一端教育程度較高的媽媽們，同樣也有些人相當熱衷於安排稚齡孩子學習各種才藝，以強化日後的成就機會。例如在銀行工作的南茜，從兒子兩歲半就送去讀經班，即使孩子當時根本坐不住，身邊家人也齊聲反對，南茜還是認為「不要浪費時間」，即早投入古典中文教育以累積未來的學業優勢。訪談時，南茜一面驚嘆班上其他更年幼孩子展現的驚人記憶力，一面遺憾孩子拒絕端坐逐字指認，因此雖能背誦卻仍識字無幾。除了讀經班之外，她亦嘗試帶孩子學圍棋，希望訓練全盤且長遠的思考方式，以及未來經營事業時必須具備的取捨能力。只可惜孩子「成熟度好像還不太夠」，無法理解下棋就是要贏的邏輯。目前南茜暫時打退堂鼓，打算過陣子再捲土重來。

另一批中產媽媽們則是對自己教導、帶領孩子的能力更有信心，也樂於投入更多時間「享受」自己教育孩子的過程。這樣的教育工作非常仰賴母親的精心規畫，並且更加受到前述純真童年論述的協商，強調提供具有豐富刺激的學習與遊戲，來開發孩子多元的認知、感受與想像能力（而有別於學術準備取向）。要進行這樣的實作，經濟資本固然重要但絕非唯一，母親本人的文化資本扮演更為關鍵的角色。²⁷ 例如身為醫師的時珍，雖然有足夠能力購買相當大量的中英文繪本給孩子（自述「一次就買二十本也不痛不癢」），但在描述日常對四歲與兩歲子女的教育時，聽到最頻繁利用的其實還是精緻且多樣化的公共資源，例如住家附近的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或是植物園。據時珍的描述，只要沒看診的下午，他就會例行地帶孩子到這些地方嬉戲，並強調不會刻意教導知識，只隨意探索玩耍，以呵護孩子的好奇心與創意。

不過，對於那些有工作的職業婦女，愈是肯定自己的教養能力，可能也愈容易感受到自己未能在孩子大腦發展關鍵期全心投入的壓力。對她們來說，造成惴惴不安的來源，與其說是來自挾帶科學光環的大腦論述，不如說是看到其他全職媽媽如何把握這段時間投入全部心力，從而讓她們憂慮自己的生涯選擇，是否會損及孩子未來的發展結果。時珍就說：

像她們都能夠規劃什麼，甚至還有一些是她的小孩要在家帶，然後弄什麼蒙特梭利在家自製教具，你看了你就會擔心說，我現在沒有投入我的孩子這麼多，我的孩子以後是不是～我們不要講（他未來）比較會不會贏，我會不會覺得事後回想起來，我這輩子我對不起他這幾年？我應該在他學齡前，我應該是全心全意奉獻給他。

27 本研究中就有住在都市的受訪者描述自己經常安排公車小旅行，帶孩子使用各種公共的親子資源與服務；住在鄉下的受訪者則展示她如何透過圖書館的通閱服務，克服鄉間圖書館藏書有限的問題。

從時珍即便已經高度投入、卻仍不免自我懷疑的喟嘆中，可以看見：一方面，家長的確愈來愈認識到學齡前作為具有十足潛力的發展階段，值得更多的親職投入；但另一方面，受「純真童年」論述所協商的早期教育活動，已經變得太「高規格」，使部份中產媽媽幾乎不敢以只購買產品、外包幼教工作為滿足，從而強化母親應在這個時期親力親為、大量投入的要求，連帶地也讓無法如此「全心全意奉獻」給孩子的母親可能遭致（自我）道德譴責。

話說回來，就像前面提到嬰孩有能力協商母親對於發展律令的選擇，母親對於教育活動的投入，同樣需要幼兒的「合作」才可能達成。但這個前提卻很少在各種發展促進的律令中被點明。在專家的腳本中，母親們彷彿只要夠努力，孩子都能乖乖地配合被教育，讓潛藏的天賦順利被開啟。原本時珍滿懷雄心壯志，認為「幼稚園老師又沒有比我們聰明，憑什麼他們能教的東西我們不能教」，設想讓小孩學前階段都在家裡接受她自行設計的「私塾」教育就好（如此一來她也勢必要留職停薪轉任全職母親）：

可是我發現根本不可能啊！譬如說我女兒（現在）在學校能夠做黏土勞作，（之前）我當然也想過要做黏土勞作……哈，光做一次我就快要暈頭了，哎唷，弟弟要拿去吃，姊姊亂貼牆壁，然後我就要救這個要去救那個！厚……然後光畫圖，我就給她弄吹畫……她弟弟就在旁邊亂搞，廣告顏料就倒了一地，那我就要去用抹布弄這個，根本就跟我當初設想的不一樣！……我根本沒有空教她，我光去弄她弟弟尿尿，然後又打翻廣告顏料，我就快要瘋掉了，然後一個下午就耗掉了，我就想說啊怎麼會這樣？（笑）

相較於許多育兒論述裡面總是展現美好的親子互動，我在訪談時反而經常蒐集到育兒過程中各種盤算落空的結果，再度讓不少母親們體認到專家建議與現實育兒的差距。畢竟超過一兩歲的幼兒，不再

只能用哭來抗拒，而是有更多展現自主性的能力。無論是對母親朗讀的故事毫無興趣，或是逕自跑出戶外玩耍，不願乖乖待在室內接受英文 CD 的刺激；又或是小孩總有自己想要的遊戲方式，無法遵循母親的教學設計。本研究認為，這些大大小小的非預期事件，可視為育兒過程中每天都可能發生的「常態失敗」（normal failures）。終究活生生的幼兒並非物品，無法按大人說東就東、指西就西，更何況還有愛說「我不要」的兩歲叛逆期。而那些看似能夠配合各種學習活動的幼兒，若非天生氣質所致，也幾乎總是需要母親花招使盡。例如前面秀惠提到講故事時要盡可能誇張才有吸引力，或是南茜敘述孩子其實一開始並不喜歡讀經，「每次都是我巴結他、罵他，說一定要去」，後來偶然發現小孩「很喜歡那種獎勵的東西」，因此私下買玩具給老師當獎品，以換取孩子合作的動機。易言之，再小的孩子也有展現自身意願的能力，因此多少都有跟父母協商各種要求的機會。即便家長總是有可能暴力逼迫孩子就範，但這樣的教養方式被專家認為特別對孩子的發展有害，也不符合主流對於理想親職的期待。

七、確保「正常性」

相較於這些追求「優化」的私己努力，對發展「風險」的控管則是國家、專業與家長的通力合作，並以具現在各種量表工具中的發展常規為標準，來確保孩子的正常性。即使多數監管工具中設定的發展指標，都立基在絕大多數孩子都能達標的「底線能力」，²⁸ 許多專家還是會鼓勵家長們提早「訓練」，以確保孩子發展「正常」的必要性。例如職能治療師王宏哲就發表〈媽媽輕鬆練，寶寶學翻身〉等系列文章，即使一開始就寫明翻身的發展時間為 4 到 7 個月，仍詳細教導家長在孩子 1-3 個月大時，就可以「用大毛巾或小毯子將孩子像捲

28 例如目前台灣最普遍可見的發展檢核表，是將該年齡抽樣群體當中大約九成以上兒童已表現出來的行為或能力當成正常的底線（鄭玲宜 2005）。

心餅樣把孩子捲起來」，再「推動孩子的骨盆以及肩膀」，讓孩子的頭「配合轉向而產生翻身的動作」，再「輕拉毯子」讓孩子翻回來。²⁹ 這類的建議並非每個媽媽都會買單，但的確有不少媽媽們認為必要照表操課，「寶寶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而這種新興的親職要求，有時候也成為引發代間照顧衝突的焦點。像是育兒論壇中，某位網友抱怨婆婆不讓四個月的孩子練習趴姿，擔心會影響接下來翻身、坐、爬、走的發展序列，甚至決定不再委由婆婆照顧孩子：

我覺得比較嚴重的是，婆婆缺乏每個階段有特定發展進程這樣的觀念，這需要主要照顧者細心觀察，避免延誤發現寶寶遲緩，錯過黃金早療期。而事實上大部分的遲緩兒，都不真正的遲緩——並非基因或先天遺傳，而是缺乏環境外界刺激！！（這類統計數字很多）……沒有什麼叫做長大自己就會了，兒童的發展應該要「在適合的時間做適當的發展」。³⁰

而無論把這些發展里程碑當成是普通孩子都能自然達成，還是強調必須在成人引導下多加訓練，多數母親確實都對兒童發展的標準化常規有一定程度的知識，也會把這種認識整合進日常育兒實作，來觀察與評估孩子的成長與轉變。不過，就算發現孩子部分面向的發展落後於常規，家長們通常仍會選擇維持住關於孩子的正常性假設（normalizing subjunctivity）（Timmermans and Buchbinder 2012），先訴諸社會既有文化知識庫中關於孩子發展的其他論述，例如個別差異、遺傳（如果父母本身自認具有類似特質），或是某些共享的常民

29 王宏哲、劉鶴珣、天才領袖教育團隊，2013年9月5日，〈媽媽輕鬆練，寶寶學翻身—兒童發展專家王宏哲〉。天才領袖親子網（<http://casanovab110.pixnet.net/blog/post/52717852-【媽媽輕鬆練-寶寶學翻身】-兒童發展專家王>，取用日期2018年6月28日）。

30 Imeating (sensitive)，2015年3月19日，〈Re: [寶寶] 四個月一定要趴著玩？〉。批踢踢實業坊，BabyMother版（telnet://ptt.cc，取用日期：2018年10月15日）。

知識與傳統信念（包括早期療育倡議者極力反對的「大雞晚啼」等說法），來解釋孩子的異樣。

例如一位自述讀過很多教養書，也接觸不少行為科學知識的媽媽，被發展評估的醫師告知一歲八個月的孩子可能有過動症傾向。她回想自身雖然早就感覺有異，但「常常告訴自己，是孩子的氣質問題」（並舉孩子甫出世就被護理師形容為「個性很急」為例）加上遺傳（「自己小時候也是個皮蛋難帶的嬰兒」）所致，打算等孩子滿三歲之後再觀察是否需要為此就醫。³¹ 易言之，家長藉由將孩子表現不如預期的部分連結到孩子的個人或家族傳記，當下的發展落後便不太會被賦予未來可能形成身心障礙的意義（只要自己並非身心障礙者）。爰此，母親們便能將孩子在發展常規上的「異常」，轉譯為家庭生命史或是孩子個人傳記中的「正常」。即使許多時候，這種轉譯過程可能遭遇專業權力的挑戰，從而讓她們必須花更多氣力來說服自己與他人認可孩子的正常性。

必須強調，這種對正常性假設的堅持，並非母親們對發展風險無知或輕忽。在標準化發展常規之外，確實存在其他競爭性的（甚至同樣有科學基礎）兒童論述，例如前面提到的「天生氣質」，鼓勵母親們正視孩子的個別差異，不該套用單一框架去裁量孩子。再者，母職的意識形態雖然要求對孩子付出無微不至的關切，但太過焦慮、過度保護的情感同樣被認為在道德上不適切，甚至對孩子有害（Beck and Beck-Gernsheim 1995），無怪乎 Jane Williams（2007）會以英國童話中的「雙頭駱馬」（pushmi-pullyu）來形容母親的矛盾處境。因此在孩子的落後不太明顯的前提之下，母親們傾向維持正常性假設，甚至反躬自省是否過度期待或焦慮。此外或許更關鍵的是：我們社會對於身心障礙的偏見與制度性歧視，使得障礙成為父母在想像孩子時不易接受的前景。孩子患有亞斯伯格症的社會工作學者洪惠芬（2017:

31 Ntmy64219（小可樂），2017 年 7 月 8 日，〈[寶寶]關於兒童發展評估兩三事〉。批踢踢實業坊，BabyMother 精華區（telnet://ptt.cc，瀏覽日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

172)，也回想當初觀察到孩子在成長過程中與他人的差異日益明顯，她遍尋資料「很希望找到孩子情緒失控的癥結，心底卻不願面對身心障礙的可能」；畢竟對大部分人來說，總認為障礙者「是跟自己生命毫無交集的他者」，更是父母必須全力為子女防堵的悲劇。

而在早期療育體制中，孩子並非總是被二分為「正常」與「障礙」兩個穩定類別，而是可能落入居間的「發展遲緩高危險群」。正如過去研究所示，當障礙的意義總是被連結到「悲劇」，遲緩或高危險群無疑意謂著孩子仍有回歸正常的「機會」和「希望」（Leiter 2007; Tseng 2017）。因此當孩子被醫療體制指派進這樣的類別，母親們通常會一起被寫入早期療育腳本，被設定必須採取積極行動，來確保、或是挽救孩子岌岌可危的正常性（Landsman 2003）。商專畢業、家住鄉間的金華，次女剛出生不久就確診有腦傷。她描述醫師在孩子出院時交待她：

反正就傷害已經造成了，但是你就是……盡量的彌補他，盡量的補救這個缺憾就對了……然後我就問那醫生，我說那你說要刺激，要怎麼刺激？我說他那麼小，我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需要什麼，或是不需要什麼，怎麼辦呢？他說沒關係，你就是，輕描淡寫的，就是帶過說，你就是多跟他唱歌啊，多講話給他聽啊！我想說：什麼？多唱歌多講話？那我就說好吧！那我就每天跟瘋子一樣，真的哦，我無時無刻講講講，講到喉嚨都乾掉，繼續講繼續講，就是一直講，還做那個字卡給他們認識，讓他們讀書這樣。就是這樣過來的。

另一位高學歷的中產母親端端，孩子是極低體重早產，由於被納入了國家衛生院主持的早產兒追蹤計畫，在兩歲前必須接受密集的發展評估，以求一旦發現遲緩狀況就能盡早介入。對於孩子一直處於落後邊緣，端端以孩子個性文靜、動作很小、評估過程中分心等因素來解釋，認為這樣的性格使得孩子「不利於考試」。端端覺得評估不只

是在考孩子，其實更是在「考父母」，因為只要小孩表現不好，評估人員就會叮囑她回去應該幫小孩加強什麼，讓她覺得「很煩」：

就是，我覺得會有點抹煞掉了，人家一般你養小孩，其實就是你、就是要看他自然發展，然後你會有一些驚喜啊或是什麼的，（但是）這個就變成說很……家長就要很介入這樣子，你要一直訓練他、教他，我覺得有點、有點變成是這樣。然後如果他表現不好，我們就會很難過，因為又會怕說他是不是遲緩啊……其實都會變這樣啦，對呀。

質言之，在日常生活中最徹底化發展律令的，經常是那些孩子被醫療系統宣告有風險的家長。商專畢業的淳貞，曾經歷孩子在三個月大時被發現「脖子太軟無法抬頭」，後來確診為腦白質過多與動作遲緩，必須安排物理治療。而在積極復健數月後，治療師認為孩子已經趕上發展進度，爾後只要父母自行注意就好。當我天真地說「那妳終於能放下心中大石了」，她馬上睜大眼睛：

我們後面要自己看，就是相對我們有更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已經被警告說他是屬於一個高危險群，那所以代表的是我們無時無刻要處在這種威脅之下……因為就算是他後面已經復原了嘛，可是對我來講，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變成是說，今天他只要現在有一個很怪的東西出現、很怪的情緒、很怪的動作、很怪的反應，我就會去聯想嘛！然後我會把自己綁在那個裡面。……不是怕我們判斷錯，然後去看醫生，這只是勞民傷財啦，那我覺得最怕的是，我們認為沒問題了就錯過，然後去害了他。

淳貞說的「錯過」，意指小孩可能會錯失所謂的「黃金期」——意即目前早期療育論述所主張：孩子在六歲以前的大腦神經有高度可

塑性，可透過訓練與復健的反覆刺激，來強化發展、修復或促進代償功能，以爭取更好的預後，甚至回歸正常的可能。不難想見，這樣的承諾對於憂懼孩子會有身心障礙風險的家長而言，是多麼值得追求的發展益品，許多家長甚至專業者也傾向認為「多做總比少做好」，只要排得進療程，就算再辛苦也「不敢說夠了」，以免孩子失去回歸正常的機會。

易言之，早期療育是那些孩子被認為有風險的家長用以追求正常性的手段。這樣的態度本身並沒有明顯的階級差異，但能近用資源的程度卻有城鄉之別。特別在醫療資源齊備的都會區，更可能被家長積極使用，即便孩子未必具有「發展遲緩」的診斷。家住台北的書云，小孩兩歲一個月時才開口說話，並被長輩認為有構音異常，敦促夫妻倆必須帶孩子去看醫生。在經歷不同醫師給予截然相反的意見之後（一位罵他們「對小孩太緊張」，另一位則認為孩子「很嚴重」），語言治療師也對孩子構音問題給出兩頰肌肉較弱的診斷，建議他們可以等孩子長大後自然改善，或是現在就接受治療「也可以」。即便他們始終沒有認定孩子就是「有問題」，書云夫婦最後仍下定決心讓孩子接受療育，除了考慮「即早發現、即早矯正」的效益之外，其實更擔心孩子可能會在進入幼兒園之後，面臨別人聽不懂她講話而遭遇挫折，甚至被貼上遲緩標籤，而影響教師、同儕，甚至孩子本身的自我認識，對父母來說會是更難處理的問題。

而在資源相對貧乏的邊陲地區，孩子同樣會因為歷經制度性的發展監管，而衝擊了原本可能對孩子發展狀況毫無警覺的家庭。與金華同樣住在南部鄉間，並在國中畢業就奉子成婚的年輕媽媽芳怡，被幼兒園老師建議帶小孩到市區醫院評估，結果判定為發展遲緩。雖然內心對這樣的評估結果有所保留，但芳怡選擇採信專業人員的說法：孩子在學齡前治療「一年可以抵過三年」成效。因此，除了每週帶孩子來回三小時車程到市區接受語言治療，也爭取學校的特教資源，並接受社會局安排每月一次到宅進行親職示範與療育。有鑑於其他家人並不認可孩子的異常鑑定，芳怡以此說服先生：

我就跟他講說姊姊她真的是需要專業的老師去教導，因為她到現在連ㄅㄆㄇ有些還幾個字唸不出來，然後如果他上小學之後她發音又不正常，然後她都不會，也學不起來，以後怎麼辦，以後書怎麼讀勒！對啊！難道要等到她長大之後，要怪你說都是你們，害我說我不會讀書，然後就做一些有的沒有的雜工？然後我想，我不如就把你調教好，至少你以後不會怨說，做媽媽沒有盡到那一份力。

相較於其他住在都會地區媽媽們所享有的早療資源，芳怡與金華能為孩子爭取到的專業服務其實相當有限，也不若其他中產父母擁有「逛專業」、評估不同治療師、主動幫孩子運籌療育計畫的能力與餘裕（曾凡慈 2010b）。雖然她們都會說專業人員「只是輔助而已，真正還是（要靠）我們家長」，但更像是基於資源匱乏而得到的體悟與決心。因此，雖然文化與經濟資本不充裕，芳怡仍盡可能「依現有的材料去刺激他們」，包括持續跟孩子進行日常對話（如問孩子今天要煮什麼、看電視時要孩子解釋情節或複述內容、在日曆紙背後教孩子畫畫順便認識顏色等等），依早療老師的指導與孩子互動（如抑揚頓挫地講故事），隨時監督與矯正孩子的發音等等。

必須承認的是，相較於其他正常孩子多少有能力協商母親追求發展優化的實作，被判定為有異常風險的嬰幼兒最沒有抵抗發展介入的自主性。雖然家長還是（在資源充裕的情況下）會盡可能希望透過各種方式提高孩子配合療育的意願（例如挑選小孩比較喜歡的治療師），但孩子基本上不太有拒絕療育的空間。淳貞就回想帶孩子積極復健的那段歲月，每次從醫院回家的途中，孩子早就因為總是邊哭邊受訓練而累到沈沈入睡，她自己則是一路默默落淚：「你就會很心疼這樣，……（但是）你要逼他，你一定不能心疼，你要放下你所有的情緒，告訴他：『嘿！再來一次！』」。

必須指出，這些帶著孩子進入療育之路的家長，並非總是被醫療判定的權威所壓倒，或是因為完全同意孩子的異常所以要積極介

入。易言之，家長可能維持在一個曖昧的位置，一面抗拒將醫療評估做為對孩子的正常化裁決（normalizing judgement），一面又將早期療育服務視為追求孩子正常性的資源與策略。這些母親深刻認識到既有的社會體制如何立基在健全主義之上，因此選擇讓孩子獲取早期療育的資源，以確保孩子能回歸正常。恰如 Stefan Timmermans 與 Mara Buchbinder（2012: 150-1）的研究所試圖翻轉的，正常化策略並非總是傅柯學派（Foucauldian）所主張是限制與壓制性的，亦可能具有創造力（creativity），生產出更多知識、判斷，對孩子的認識，以及透過介入來追求更多的生命機會。

八、結論

本研究區分出四種對當代台灣母親早期育兒深具影響力的發展律令，分別強調情感依附、社會適應、大腦開發與正常性，各自訴諸不同派別的心理學、腦神經科學，或是早期療育專業，將孩子建構為具情感需求的主體、依後天模塑的客體，或看重其具無限潛力的大腦，或有異常風險的身體；而相應地，母親身為主要照顧者，被課責扮演回應者、主導者、教育者，或是與醫療專業協力等不同角色，按照專家建議，在日常育兒中實踐親密教養、培養規律作息、提供豐富環境，或是依標準化量表定期監管與訓練，以期最大化孩子未來的心理福祉、道德人格、競爭優勢，或是確保健全身體。

有意思的是，這四種發展律令在論述的原生國家乃隨著各時期兒童相關科學研究的典範而轉移，在台灣卻是於 2000 年前後幾乎同步引入，形構出早期童年育兒場域中眾聲喧嘩的狀態。作為親職治理的工具，這些異質律令的同時存在，無疑增加衝突的可能，卻也削弱了單一論述的權威，為行動者打開彈性選擇的空間。抱持不同親職價值與育兒期待的母親，都能在多樣化的專家建議中（並且都有心理學或腦神經科學的背書），習得知識與技術來調控自身的育兒行為，以追求不同的發展益品。就算孩子反應不符合論述所預設的腳本，母親們

不見得就只能落入教養失敗或是壞媽媽的主體位置，也可能轉向另一套發展論述，嘗試其他專家所認可的育兒模式。當然這並不表示她們就不再因為育兒挫折而感到焦慮與罪惡，畢竟這些情緒本身就是受到論述所動員，在母親發現自身實作或孩子表現與專家說法不相稱時被喚起，以徵召更多的教養投入。而這樣的情感狀態，同時為台灣主流的家庭觀念與母職期待所強化——社會不但期待母親應對學齡前的子女全力奉獻，孩子的養育與照顧更普遍被視為私己的責任。³² 與此同時，當代母親們也經常感受到台灣社會的快速變遷，從而更加意識到孩子所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這種跨階級的不安全感（Lan 2018），亦可能強化母親投資孩子早期童年的決心。因此，發展律令作為連結異質知識—情感—道德責任—實作技術的治理工具，母親們不被預設要做為理性客觀的公民，計算孩子的成功機會來衡量親職的投入，而是以「愛」之名，期待她們為了愛而願意付出不成比例的心力，來追求實際上無法確保的發展益品。

而這種「無法確保」，不只來自孩子成長過程中總有太多變數干擾。母親愛得越多投入越力，同樣被建構為孩子發展的風險因子，即便因果關係不可能證明。例如母親被要求對孩子需求高敏感與高回應性，但又不能對孩子「有求必應」到導致孩子降低學習語言或生活自理的動機；社會適應的發展律令或有助於道德人格養成，但專家認為若對孩子造成過度壓力，恐影響社會情緒發展與大腦發育（曾多聞 2016）；媽媽們被告知嬰幼兒階段是大腦開發的黃金期，卻又被警告過多外來刺激會造成腦部「封閉」，讓嬰幼兒容易哭鬧或出現負面行為（孫立歲 2014）；這些過猶不及的作法恐都危及孩子的正常性。易言之，發展律令的異質不只帶來解放的效果，它的內在聯繫與矛

32 根據中央研究院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6 年「家庭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社會中仍有過半（51.1%）民眾支持「如果母親外出工作，對還沒上小學的小孩比較不好」（雖然長期來說呈現下降趨勢），而對於「小孩的養育和照顧應該是政府的責任還是個人／家庭的責任？」一題，更是高達 66.4% 的民眾認為「大部分是」或「都是」個人／家庭的責任（相較於 2006 與 2011 年的調查都只有 59%）（傅仰止等 2017）。

盾，同時建構出可能顧此失彼、動輒得咎的風險，不只深化個別母親的焦慮，也加劇遵奉不同律令或不同實作取向母親之間的分化。

但另一方面，發展律令又只是理念型的建構，必須在實作中歷經協商。母親們總會在與嬰幼兒的真實互動中反覆調整，甚至雜揉使用，以更符合孩子與自身的需求。因此，不乏有重視情感依附的媽媽們，透過記錄寶寶作息來「發現」嬰孩的自發規律，並藉此嘗試穩定化育兒節奏與家庭秩序；主張社會適應的母親，大多也會視嬰兒的反應，來折衷專家建議的訓練方式，希望兼顧孩子安全感與達到規訓目的。被納入本研究的母親們，或許無法拒絕發展律令的召喚，³³但她們的確很少對專家建議的育兒方式照單全收。中產階級的母親特別能從論述本身的異質性中，獲取反思甚至質疑特定主張的資源；勞動階級的媽媽們，也經常能素樸地訴諸孩子有個別差異、專家總是「太理論」而不符現實，來抵抗任一優化律令所要求的教養建議。而或許更重要的是，這種與發展律令協商的能力不只來自母親一方，嬰幼兒本身同樣是育兒過程的重要參與者，沒有他們的合作，任何教養腳本都無法輕易實現。

本研究從而突顯出育兒行為作為治理對象的獨特性。立基於既有研究的論點，透過論述的治理要能夠運作，需經由個人的行動能力加以活化，並且當論述中所預設的特定主體位置被個人認可為符合他們的利益（或興趣）（interests），最能發揮治理的效果（Weedon 1987）。然而，本研究也同時發現：母親們的利益與興趣並非總是固定不變。哪種發展益品值得追求、以及應該經由何種途徑，也總有著詮釋的彈性，必定在論述與實作中動態來回，不斷隨著嬰幼兒的發展進度，乃至於孩子本身的回應與意願而逐步調整。畢竟嬰幼兒也有自身的利益與興趣，他們亦會隨著發展進程而有著日益明確的表達能力。育兒終究是與（特定）孩子在真實生活情境裡進行長期互動的獨

33 即使自外於發展優化的親職要求（例如藍佩嘉（2004）研究中實踐「順其自然造化」的勞動階級家長），孩子仍是正常性律令所凝視、甚至被強化監管的對象。

特歷程，隨著發展中孩子在各生命階段不同的變化，母親們持續試行新的育兒建議、尋求彼此適配的照顧實作，從而能協商發展律令的規範性期待，以及對孩子（乃至於對自我）的認識與期望。

誌謝：本研究寫作過程中，承蒙「貓奴寫作會」智友黃于玲、簡好儒細心閱讀初稿並給予重要回饋；早期版本先後發表在 2018 年「科技與社會年會」及「當代兒少研究的多元對話」研討會，感謝評論人張弘潔、官晨怡及其他與會者的建設性意見。最後更感謝《台灣社會學》兩位審查人與編委會的寶貴修改建議，讓這篇論文立論更完整。

附錄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化名	年齡	居住	教育	職業	子女（年齡）	發展狀況
1	正姊	30-34	新北	專科	會計	女 4Y；女 2Y	一般
2	建茹	30-34	台北	大學	公務員	男 2Y	一般
3	南茜	30-34	台北	大學	銀行員	男 4Y	一般
4	允文	30-34	台北	博士	教授	男 2Y；女 1M	一般
5	書云	30-34	台北	大學	家管	女 4Y	發展遲緩
6	米夏	30-34	新北	商專	業務	女 3Y	早產兒
7	舒梅	25-29	台北	專科	記帳	男 5Y；男 3Y	一般
8	淑蘭	25-29	台北	五專	家管	男 5Y；女 4Y	一般
9	溫媽	35-39	台北	二技	自營	女 7Y；女 4Y； 男 2Y	一般
10	南麗	25-29	台北	國中	打工	男 4Y；男 2Y	一般
11	筱清	35-39	台北	高職	家管	男 7Y；男 4Y	一般
12	端端	40-44	台北	博士	教授	男 2Y	早產與生長遲緩
13	貝媽	35-39	新北	大學	家管	男 8Y；男 5Y	次子感統失調
14	玫琦	35-39	台北	大學	企畫	女 6Y	過動
15	卡蘿	35-39	新北	大學	業務	男 1Y	發展遲緩
16	陽姿	35-40	台北	專科	家管	男 2Y	一般
17	明宜	30-34	新竹	大學	教師	女 3Y；男 6M	一般
18	幸安	30-34	新竹	大學	家管	男 3Y	一般
19	珈卉	35-39	新竹	大學	教師	男 5Y	一般
20	淳貞	30-34	新竹	商專	家管	男 3Y	曾經遲緩
21	竹君	30-34	新竹	大學	家管	男 3Y；男 1Y	長子早產與發展遲緩
22	梅庭	35-39	新竹	二技	家管	女 7Y；女 5Y； 雙男 3Y	一般
23	惠良	30-34	台中	二專	文書	女 2Y；男 7M	一般
24	芳慧	35-39	台中	碩士	教師	女 2Y；男 3M	一般
25	何眉	30-34	台中	專科	會計	女 3Y；男 4M	一般
26	蕭蕭	40-44	台中	專科	護士	男 10Y； 男 8Y；男 2Y	次子疑似過動
27	古媽	40-44	台中	高中	自營	女 10Y；男 7Y；男 4Y	一般
28	雅婷	20-24	台中	高職	家管	男 1Y	一般
29	時珍	30-34	台中	大學	醫師	女 4Y；男 1Y	一般
30	韓子	30-34	台中	大學	作家	女 8Y；男 6Y	子亞斯伯格

編號	化名	年齡	居住	教育	職業	子女（年齡）	發展狀況
31	喜欣	40-44	台南	高職	家管	男 13Y；女 2Y	一般
32	阿春	30-34	台南	專科	店員	男 6Y；女 4Y	一般
33	佳樺	30-34	台南	二技	自營	男 7Y；女 4Y； 女 1Y	一般
34	薇如	25-29	台南	二技	家管	男 10M	一般
35	金華	40-44	台南	商專	自營	女 6Y；女 6Y； 男 1Y	次女腦傷略遲緩
36	秀惠	30-34	台南	高職	家管	男 4Y；女 2Y	子疑似過動
37	思佳	30-34	台南	高職	自營	女 8Y；女 6Y； 男 4Y	次女疑注意力不足
38	芳怡	20-24	台南	國中	自營	女 8Y；女 6Y； 男 4Y	長女輕度智障，次女 與么子遲緩
39	樂娘	30-34	台南	碩士	家管	女 1Y	發展遲緩
40	冠姊	35-39	台南	國中	打工	男 8Y；男 4Y	次子發展遲緩
41	魚兒	25-29	台南	高職	作業員	男 6Y；男 4Y	長子疑似過動

參考文獻

- 李宜蓁，2010，〈適性的早期教育，給孩子剛剛好的養分〉。收入《親子天下特刊：0~6 歲寶寶的腦關鍵問答》。台北：天下雜誌。
- 林佩蓉，2007，《解開孩子成長的密碼——0-6 歲嬰幼兒發展手冊》。台北：教育部。
- 林奐均著、許惠琚譯，2006，《百歲醫師教我的育兒寶典》。台北：如何。
- 林文瑛、王震武，1995，〈中國父母的教養觀：嚴教觀或打罵觀？〉。《本土心理學研究》3: 2-92。
- 信誼基金會，2004，〈前言〉。頁 5-6，收入 John T. Bruer 著、王淑娟譯，《3 歲，真的定終身嗎？從早期大腦發展看孩子的學習關鍵期》。台北：信誼基金。
- 洪惠芬，2017，〈我的孩子不一樣——如何面對特殊孩子的「身分」難題與他所遭遇的歧視？〉。頁 171-181，收入梁莉芳等，《做爸媽的一百種方式：尋找懷孕、生產、教養的更多可能》。台北：大家。
- 范代希，2017，〈另類科學母職與順勢療法〉。《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1: 51-104。
- 孫立葳，2014，《跟著大師教孩子：8 個理論、10 位大師觀點，啟發孩子的學習智慧》。台北：天下文化。
- 梁莉芳，2018，〈養育「無污染」的孩子：有機食品論述、風險管理與母職實作〉。《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2: 73-125。
- 陳婷玉，2010，〈當媽媽真好？流行婦幼雜誌的母職再現〉。《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6: 33-86。
- 陳富美，2005，〈親職效能感、教養行為與孩子生活適應之關係研究〉。《輔導與諮商學報》27(1): 47-64。
- 傅仰止、章英華、廖培珊、謝淑惠編，2017，《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七期第二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https://srda.sinica.edu.tw/srda_freownload.php?recid=1064&fileid=9693）。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曾凡慈，2008，〈發現「遲緩兒童」：科學認知、權力技術與社會秩序〉。《台灣社會學》15: 165-215。
- ，2010a，《兒童發展的風險治理：發展遲緩、監管網絡與親職政治》。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2010b，〈醫用者的運籌行動：形塑早期療育的照護軌跡〉。《台灣社會

- 學刊》45: 63-116。
- 曾多聞, 2016, 〈睡眠訓練只要適當, 不會造成寶寶永久心理傷害〉。親子天下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1275-睡眠訓練只要適當,不會造成寶寶永久心理傷害/>, 取用日期: 2019 年 2 月 25 日)
- 葉錦雪, 2015, 〈成功哺乳之衛教〉。《台灣醫學》19(6): 643-649。
- 衛生福利部, 2016, 《中華民國 103 年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台北: 衛生福利部。
- 鄭玲宜, 2005, 《「台北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信效度分析與修訂研究》。台北: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九十三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賴亞伶, 2009, 《於母嬰同室政策下比較不同生產方式的產婦產後疲倦、嬰兒照顧活動及親子依附之差異》。高雄: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藍佩嘉, 2008, 《跨國灰姑娘: 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 行人。
- , 2014, 〈做父母、做階級: 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台灣社會學》27: 97-140。
- Bowman, Madia Linton 著、許惠琄譯, 2016, 《丹瑪醫師說》。台北: 道聲。
- Sears, William 與 Martha Sears 著、張嘉倩譯, 2000, 《親密育兒百科》。台北: 天下文化。
- Apple, Rima D. 1995. "Constructing Mothers: Scientific Motherhood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8(2): 161-178.
- Armstrong, Natalie and Elizabeth Murphy. 2012. "Conceptualizing Resistance." *Health* 16(3): 314-326.
- Beck, Ulrich and Elisabeth Beck-Gernsheim. 1995. *The Normal Chaos of Love*. Oxford: Polity.
- Bloom, Benjamin S. 1964.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Human Characteris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Wiley.
- Bowlby, John. 1969. *Attachment and Loss, Volume 1: Attachment*. London: Pelican Books.
- Britto, Pia Rebello and Rafael Pérez-Escamilla. 2013. "No Second Chances? Early Critical Periods in Human Development."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97: 238-240.
- Broer, Tineke and Martyn Pickersgill. 2015. "Targeting Brains, Producing Responsibilities: The Use of Neuroscience within British Social Polic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32: 54-61.
- Bruer, John T. 1999. *The Myth of the First Three Year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Early*

- Brain Developm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Budds, Kirsty, Margaret K. Hogg, Emma N. Banister, and Mandy Dixon. 2017. "Parenting Agendas: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tensive Mothering and Infant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5(2): 336-352.
- Chin, Tiffani and Meredith Phillips. 2004.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Child-rearing Practices: Social Class, Children's Agency, and the Summer Activity Gap."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7(3): 185-210.
- Clarke, Juaane N. 2014. "Tracking Governance: Advice to Mothers about Managing the Behaviour of their Children in a Leading Canadian Women's Magazine During Two Disease Regimes." *Critical Public Health* 24(3): 253-265.
- Cook, Daniel Thomas. 2009. "Children's Subjectivities and Commercial Meaning: The Delicate Battle Mothers Wage When Feeding Their Children." Pp. 112-129 in *Children, Food and Identity in Everyday Life*, edited by Allison James, Anne Trine Kjørholt, and Vejbørg Tingsta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Cooper, Davina. 1998. *Governing Out of Order: Space, Law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London: Rivers Oram Press.
- Craig, Gillian M. and Graham Scambler. 2006. "Negotiating Mothering against the Odds: Gastrostomy Tube Feeding, Stigma, Governmentality and Disabled Childre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2(5): 1115-1125.
- de Beistegui, Miguel. 2018. *The Government of Desire: A Genealogy of the Liberal Subj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aircloth, Charlotte. 2010a. "'If They Want to Risk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Their Child, That's Up to Them': Long-term Breastfeeding, Risk and Maternal Identity." *Health, Risk & Society* 12(4): 357-367.
- . 2010b. "'What Science Says is Best': Parenting Practices, Scientific Authority and Maternal Identity."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5(4): 1-14.
- . 2013. *Militant Lactivism?: Attachment Parenting and Intensive Motherhood in the UK and France*. Oxford: Berghahn Books.
- Foucault, Michel. 1988.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Pp.16-19 in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edited by Luther H. Martin, Huck Gutman, and Patrick H. Hutto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Frederick, Angela. 2017. "Risky Mothers and the Normalcy Project: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Negotiate Scientific Motherhood." *Gender & Society* 31(1) 74-95.
- Furedi, Frank. 2008. *Paranoid Parenting: Why Ignoring the Experts May Be Best for*

- Your Child* (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 Geinger, Freya, Michel Vandenbroeck, and Griet Roets. 2014. "Parenting as a Performance: Parents as Consumers and (De)constructors of Mythic Parenting and Childhood Ideals." *Childhood* 21(4): 488-501.
- Goh, Esther C.L. and Leon Kuczynski. 2009. "Agency and Power of Single Children in Multi-Generational Families in Urban Xiamen, China." *Culture & Psychology* 15(4): 506-532.
- Grant, Julia. 1998. *Raising Baby by the Book: 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Mother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ays, Sharon. 199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ulbert, Ann. 2004. *Raising America: Experts, Parents, and a Century of Advice About Childre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Jensen, Tracey. 2010. "Warmth and Wealth: Re-imagining Social Class in Taxonomies of Good Parenting." *Studies in the Maternal* 2(1): 1-13.
- Kagan, Jerome. 1998. *Three Seductive Idea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eenan, Julia and Helen Stapleton. 2009. "'It Depends What You Mean by Feeding 'on Demand'': Mothers' Accounts of Babies' Agency in Infant-Feeding Relationships." Pp. 13-34 in *Children, Food and Identity in Everyday Life*, edited by Allison James, Anne Trine Kjørholt, and Vebjørng Tingsta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King, Caroline. 2018. "'It Depends What You Class as Vulnerable': Risk Discourse and the Framing of Vulnerability in Health Visiting Policy and Practice." *Families, Relationships and Societies* 7(1): 39-54.
- Lan, Pei-chia. 2018.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dsman, Gail H. 2003. "Emplotting Children's Lives: Developmental Delay vs. Disabilit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6(9): 1947-1960.
- . 2009. *Reconstructing Motherhood and Disability in the Age of "Perfect" Babies*. New York: Routledge.
- Lee, Ellie, Jan Macvarish, and Jennie Bristow. 2010. "Risk, Health and Parenting Culture." *Health, Risk & Society* 12(4): 293-300.
- Lee, Ellie, Jennie Bristow, Charlotte Faircloth, and Jan Macvarish. 2014. *Parenting Culture Studies*.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Leiter, Valerie. 2004. "Dilemmas in Sharing Care: Maternal Provision of Professionally-

- Driven Therapy fo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8(4): 837-849.
- . 2007. “‘Nobody’s Just Normal, You Know’: The Social Creation of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5(8): 1630-1641.
- Lowe, Pam, Ellie Lee, and Jan Macvarish. 2015. “Biologising Parenting: Neuroscience Discourse, English Social and Public Health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s of the Child.”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37(2): 198-211.
- Lupton, Deborah A. 2011. “‘The Best Thing for the Baby’: Mothers’ Concepts and Experiences Related to Promoting Their Infants’ Health and Development.” *Health, Risk & Society* 13(7-8): 637-651.
- Macvarish, Jan. 2014. “Babies’ Brains and Parenting Policy: The Intensive Mother.” Pp. 165-183 in *Parenting Culture Studies*, edited by Ellie Lee, Jennie Bristow, Charlotte Faircloth, and Jan Macvaris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 2016. *Neuroparenting: The Expert Invasion of Family Lif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Mantilla, María Jimena. 2015. “Educating ‘Cerebral Subjects’: The Emergence of *Brain Talk* in the Argentinean Society.” *BioSocieties* 10(1): 84-106.
- McNaughton, Darlene. 2011. “From the Womb to the Tomb: Obesity and Maternal Responsibility.” *Critical Public Health* 21(2): 179-190.
- Murphy, Elizabeth. 2000. “Risk, Responsibility, and Rhetoric in Infant Feed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9(3): 291-325.
- . 2003. “Expertise and Forms of Knowledge in the Government of Familie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1(4): 433-462.
- Nadesan, Majia Holmer. 2002. “Engineering the Entrepreneurial Infant: Brain Science, Infant Development Toys, and Governmentality.” *Cultural Studies* 16(3): 401-432.
- . 2010. *Governing Childhood Into the 21st Century: Biopolitical Technologies of Childhood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O’Reilly, Andrea. 2010. *Encyclopedia of Motherhoo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Quirke, Linda. 2006. “‘Keeping Young Minds Sharp’: Children’s Cognitive Stimulation and the Rise of Parenting Magazines, 1959-2003.”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43(4): 387-406.
- Reich, Jennifer A. 2014. “Neoliberal Mothering and Vaccine Refusal: Imagined Gated Communities and the Privilege of Choice.” *Gender & Society* 28(5): 679-704.
- Romagnoli, Amy and Glenda Wall. 2012. “‘I Know I’m a Good Mom’: Young, Low-

- Income Mothers' Experiences with Risk Perception, Intensive Parenting Ideology and Parenting Education Programmes." *Health, Risk & Society* 14(3): 273-289.
- Rose, Nikolas. 1990. *Governing the Soul: The Shaping of the Private Self*.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Ryan, Kath, Paul Bissell, and Jo Alexander. 2010. "Moral Work in Women's Narratives of Breastfeeding."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0(6): 951-958.
- Ryan, Sara and Katherine Runswick-Cole. 2008. "Repositioning Mothers: Mothers, Disabled Children and Disability Studies." *Disability & Society* 23(3): 199-210.
- Salmon, Amy. 2011. "Aboriginal Mothering, FASD Prevention and the Contestations of Neoliberal Citizenship." *Critical Public Health* 21(2): 165-178.
- Sears, William and Martha Sears. 2001. *The Attachment Parenting Book: A Commonsense Guide to Understanding and Nurturing Your Baby*. Lond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Siege, Alexander W. and Sheldon H. White. 1982. "The Child Study Movement: Earl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ymbolized Child." *Advances in Child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17: 233-285.
- Smyth, Ciara. 2015. "Getting Ahead in the Preschool Years: An Analysis of a Preschool Enrichment and Entertainment Market." *Sociology* 50(4): 731-747.
- Strathman, Terry. 1984. "From the Quotidian to the Utopian: Child Rearing Literature in America, 1926-1946."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29: 1-34.
- Thornton, Davi Johnson. 2011. "Neuroscience, Affect, and the Entrepreneurialization of Motherhood."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8(4): 399-424.
- Timmermans, Stefan and Mara Buchbinder. 2012. *Saving Babies? The Consequences of Newborn Genetic Screen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seng, Fan-Tzu. 2017. "From Medicalisation to Riskisation: Governing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39(1): 112-126.
- Urwin, Cathy. 1985. "Constructing Motherhood: The Persuasion of Normal Development." Pp. 164-202 in *Language, Gender, and Childhood*, edited by Carolyn Steedman, Cathy Urwin, and Valerie Walkerdin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Urwin, Cathy and Elaine Sharland. 1992. "From Bodies to Minds in Childcare Literature: Advice to Parents in Inter-War Britain." Pp.174-199 in *In the Name of the Child: Health and Welfare, 1880-1940*, edited by Roger Coot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Valencia, Lorena. 2015. "Being a Mother, Practicing Motherhood, Mothering Someone: The Impact of Psy-Knowledge and Processes of Subjectificatio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6(9): 1233-1252.
- Wall, Glenda. 2004. "Is Your Child's Brain Potential Maximized?: Mothering in an Age of New Brain Research." *Atlantis* 28(2): 41-50.
- . 2010. "Mothers' Experiences with Intensive Parenting and Brain Development Discours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33(3): 253-263.
- . 2013. "'Putting Family First': Shifting Discourses of Motherhood and Childhood in Representations of mothers' Employment and Child Car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40: 162-171.
- . 2018. "'Love Builds Brains': Representations of Attachment and Children's Brain Development in Parenting Education Material."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40(3): 395-409.
- Ward, Steven C. 2002. *Modernizing the Mind: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and the Remaking of Society*.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 Weedon, Chris. 1987.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Williams, Jane. 2007. "Learning from Mothers: How Myth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ffect the Detection of Subtle Developmental Problems in Children."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33(3): 282-290.
- Wrigley, Julia. 1989. "Do Young Children Need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Experts' Advice to Parents, 1900-1985."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29(1): 41-75